

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 ——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

陳芳妹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琺瑯供器與簠簋銅祭器，可能因為送禮者在位時間較康熙與乾隆帝皆短，復因禮物珍藏在曲阜孔廟，其意義殊少引起學界關注。

本文以為畫琺瑯五供及其典型，從贊助者情境、製造情境與不同使用情境間的位移，呈現複雜的情境間的交錯網，對理解其視覺特色是不可忽視的視角。本文想先從此器群最直接被使用而尚未被充分討論的釋奠祭器發展史角度談起。進而希望在其與畫琺瑯及五供發展史的三線交會中，由「物」及於「人」，以為贊助者贊助時所身處的皇帝身分的複雜歷史情境，對此群物的理解很重要。此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協助說明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

本文論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此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提供理解的視角。再者，銅胎畫琺瑯五供之外，雍正庚戌（1730）紀年銅簠簋等禮物，本文將論及其與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制禮的關係，以重建被忽視的雍正朝在清帝國國家禮儀禮器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關鍵詞：畫琺瑯五供、闕里、壽皇殿、釋奠祭器

一、前言

與父皇康熙帝（1654-1722）在位六十一年（1661-1722）及兒子乾隆帝（1711-1799）在位六十年（1735-1796）相比，雍正帝（1679-1735）在位僅十三年（1722-1735）。確實，在位時間不到父子四分之一的雍正帝，對孔廟視覺圖像及對清帝國國家祭器系統的形塑，向為學界所忽視。

乾隆四十一年（1776），蔣元樞為臺灣府學從吳中進口〈孔廟禮器圖說〉祭器，特別是花瓶、香爐及燭臺。這種源自佛道脈絡的五供視覺圖像在臺灣孔廟出現，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銅胎黃地畫琺瑯五供（圖1）實啟其端。至於簠簋等，也因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另一半「大清雍正庚戌（1730）年造」款銅簠簋尊壺等祭器，孕育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祭器復古端倪（圖2）。乾隆帝因此宣稱「皇考……按經典，範銅為器，頒之闕里……朕思……祭器亦應悉用古制」，終扭轉「前代以盤充數」之局。清帝國以「乾隆十三年（1748）欽定祭器」器制，及於銅陶瓷木漆等質材與色彩等，隨之確立。

臺灣知府蔣元樞「遠求吳市，製造彝器，一石一器，必澤於古」，自謂「按闕里制度」。在清帝與儒家聯手以治帝國下，朝廷與邊陲海外臺灣，以祭器祭儀展演禮制間，中央與地方實共同指出闕里不容忽視的觸媒角色。康熙、雍正與乾隆三帝與儒家的關係，禮器、禮制祭儀間的確立，闕里成為展演的關鍵舞台。

二、研究簡史與新議題

（一）學界研究基礎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琺瑯供器與簠簋銅祭器，可能因珍藏在曲阜孔廟，較少引起學界關注。比起簠簋銅祭器之罕見研究，琺瑯供器近來已漸為學界所關注。在1985年，Helmut Brinker 和 Albert Lutz 已根據 Bernd Melchers 1916-1919 的潭柘寺等陳列的祭器照片，¹ 首先提出琺瑯五供類型，散布在孔廟、佛寺與道教廟宇，可見儒佛道寺廟等是琺瑯器的重要贊助者。² 琺瑯器五供類型與贊助者的關係得到初

1 Bernd Melchers, *China: der tempelbau die lochan von ling-yan-si ein hauptwerk buddhistischer plastic*, Hagen: Folkwang-verlag G. M. B. H., 1922.

2 Helmut Brinker and Albert Lutz,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New York: Asia Society Galleries 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52-53.

步的關注。唯「使用者」是否即是促進生產琺瑯器五供的最原始「贊助者」，以及「贊助者」為何及如何贊助，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近二十年來，這群供器更具體地被放在畫琺瑯與五供發展史檢視了。2002 年《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³以「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五供」為名，首次以彩版公布現藏曲阜孔子博物館的五供，計合影一及個別圖像三，包括「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香爐」一件、「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觚」一對、「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燭台」一對。

在大多數以臺灣國立故宮院及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要資料的學界有關琺瑯史論述中，⁴楊伯達首先引入孔子博物館的五供資料，⁵以為是雍正十年雍正帝頒賜曲阜孔廟者，足以代表「雍正晚期琺瑯風格面貌」。他不只確認皇帝是贊助者，更精確地認定是雍正晚期風格代表作，但如何及為何等問題則尚未涉及。撰寫分說明的唐麗更稱此器群，是雍正朝唯一一套年代確切的畫琺瑯五供。唯該器群已不完整，唐麗雖已指出失座，可能因為該五件器底皆連有三長條型短足，似為接連他器用？但她卻將「花瓶」稱為「觚」，推測其功能作「香筒」用。因此雖稱此器群為「五供」，卻分別以「香爐」、「燭台」及「觚」稱之。

2005 年，Josh Yiu 在其五供研究的博士論文中，根據 1913 年 Albert Kahn 在曲阜孔廟大成殿照的五供祭器圖（圖 3）、北京國子監，以及《國子監志》圖為例，

3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 5·琺瑯器（一）》（石家莊：河北美術，2002），頁 190-193，圖版 222-225。2010 年畫琺瑯五供再經公佈，Lu Wensheng, Julia K. Murray, *Confucius His Life and Legacy in Art*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2010), 101-103.

4 臺灣方面著作例如：張臨生，〈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故宮學術季刊》，17 卷 3 期（1983 春），頁 25-38；張臨生，〈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15 卷（1987.2），頁 265-306；陳夏生，〈明清琺瑯工藝概論〉，收入陳夏生、蔡依倫，《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頁 39-48；陳夏生，〈再談清代服飾中的朝珠與手串〉，《故宮文物月刊》，274 期（2006.1），頁 88-96；施靜菲，〈十八世紀東西交流的見證：清宮畫琺瑯製作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3 期（2004 春），頁 45-94；施靜菲，〈雍正朝琺瑯器中的仿古品味〉，《故宮文物月刊》，319 期（2009.10），頁 76-83；施靜菲，〈文化競技：超越前代、媲美西洋的康熙朝清宮畫琺瑯〉，《民俗曲藝》，182 期（2013.12），頁 149-219；施靜菲、彭盈真，〈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軸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29 卷 3 期（2012 春），頁 1-74；施靜菲、王崇齊，〈乾隆朝粵海關成做之「廣琺瑯」〉，《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5 期（2013.9），頁 87-184；李久芳主編，《金屬胎琺瑯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中國方面著作例如：李久芳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9·竹木骨牙角雕 琺瑯器》（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 13-23、235-300；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琺瑯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5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楊伯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0·金銀玻璃琺瑯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58-208，圖版說明頁 90-113；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第 5 冊·琺瑯器（一），圖版 222-225，分說明，頁 74-75。

從五供祭器發展史的脈絡中，不只指出五供形成中佛、道脈絡的重要性，更首先指出五供祭器在清代多種使用情境中，與祭孔的使用情境關係，⁶曲阜孔廟琺瑯五供與五供發展史開始有了繫連。

2018 年，張瀨予將此五供引入雍正朝銅胎畫琺瑯發展史脈絡。在楊伯達、張臨生、施靜菲、許曉東等有關清初宮廷及相關地方銅胎畫琺瑯，以及余珮瑾有關雍正瓷胎畫琺瑯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⁷進一步從孔廟銅胎琺瑯五供的使用脈絡，首先指出其與壽皇殿及其他祭祀空間包括恩佑寺、大高殿的關係，以探討其背後意涵。⁸該研究提供理解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畫琺瑯五供相當重要的視角。

（二）新議題的提出

本文以上述研究為基礎，再論其尚未被討論或充分討論的歷史情境。從贊助者、製造者與不同使用情境間的位移所呈現複雜情境間的交錯，以為畫琺瑯五供及其典型，對理解其視覺特色是不可忽視的視角。特別想先從釋奠祭器發展史角度談起，進而希望在其與畫琺瑯及五供發展史的三線交會中，由「物」及於「人」，以為贊助者贊助時所身處的皇帝身分之複雜歷史處境，對此群物的理解很重要。特別是因為此禮物的產出與典型再造，及祭祀對象的位移，對贊助者可能相當重要。無論是本無立意對外公布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內務府奏銷檔案》留下皇帝對禮物製作單位的下旨，及對應的相關單位的奏案；或止於雍正九年（1731）的雍正帝對內閣的《上諭》；起居注官即時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特別是《起居注》所失載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之死到起居注開始記錄的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乾隆年間始刊行的《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以及雍正帝欲向萬民辯解，下令必讀，復經乾隆帝列為禁書的《大義覺迷錄》；記錄雍正帝向孔子的告祭文等的《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等資料，提供贊助者本身對贊助禮物及祭祀對象相關的直接有意或無意之談話，或可能經近臣記錄皇帝的「自我形

6 Josh Yiu, "The Display of Fragrant Offerings: Altar Sets in China" (PhD diss., Oxford University, 2005), p.86.

7 張臨生，〈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頁 25-38。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協會科學史所合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71-335。余珮瑾，〈傳承突破與轉折——清雍正朝琺瑯彩瓷的發展〉，收入余珮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280-297。

8 張瀨予，〈清雍正朝銅胎畫琺瑯器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8），頁 19。

塑」。多元蛛絲馬跡，相互參證，為贊助者角度所能提供對禮物的理解，有著不容忽視的視角。

「物」的製造情境與使用情境是贊助者決定的。「物」不只從贊助者的歷史情境中被製造、被產出，並位移以使用在受贈者的多重歷史情境中。從雍正帝欽定的壽皇殿典型以祭拜康熙帝御容，此首先被使用在皇帝的皇考御容崇拜之原始情境，到祭拜孔子，在幾近十年的使用情境後，時空及情境的移轉間，實糾結著愛新覺羅宗族及民間對雍正帝皇權合法性及難以揮去的滿人統治的夷狄質疑。雍正帝在從康熙帝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崩、母親孝恭仁皇后徽號未及上，已先在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三日相繼崩亡，雍正帝為父母守喪三年的孝子形象的形塑，⁹與《大義覺迷錄》中皇上「謀父」與「逼母」說的反差間之激盪，以及雍正二年（1724）曲阜孔廟「不戒於火」及民間「人君不德」說，¹⁰與國子監文廟禮敬孔子一系列政策變革間的反差。在謠言流竄與皇帝向萬民發行《大義覺迷錄》的自我辯解中，到雍正十年罕見大型銅胎畫珐瑯的水運送達曲阜，作十八世紀初大型珍貴禮物的皇家與闕里間之世紀性移動。這種「物」與贊助者情境所呈現的平行與反差現象，以及身為皇帝選用祭器所影響帝國禮制變革的程度，皆成為本章關注的新焦點。

本文以為再論此銅胎畫珐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珐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珐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提供理解的視角。再者，銅胎畫珐瑯五供之外，雍正庚戌（1730）紀年銅簠簋爵登銅豆（圖2）等禮物，本文將以「簠簋」通稱，論及其與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制禮的關係，以重建被忽視的雍正朝在清帝國國家禮儀禮器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三、從視覺圖像出發

（一）畫珐瑯五供較完整圖像的建構——從十八到二十一世紀

雍正帝於雍正十年（1732）送給曲阜孔廟的禮物，內容與圖像為何？製造單位

9 新皇帝關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裝斂好他父親的遺體。馬國賢（Matteo Ripa），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05。

10（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據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輯36，卷1，頁35、95；卷3，頁15。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0-31。

與受禮單位已分別各自留存一份內容清單及製造時間。但只有文字，沒有圖像。確實，2005 年始出版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提供該器群贊助者、製造單位及成品製成時間，以及接受禮物的單位。其為雍正帝在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二十九日下旨養心殿造辦處為文廟所造的琺瑯供器，雍正十年（1732）三月十一日告成，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水運送出，¹¹ 可見此器群製造時間長達二年半。

禮物圖像為何？2002 年《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¹² 以「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五供」為名，首次以彩版公布（圖 4）。唯此圖像，比較 1913 年照片（圖 3），知已非雍正帝禮物的完整原貌。不只一如唐麗已稱的「失座」。根據皇家送禮方及受禮的孔家皆有紀錄。感謝曲阜孔子博物館惠允查閱孔府檔案，是當時衍聖公孔傳鐸《闕里盛典》手寫稿所留下最即時的紀錄，可惜尚未出版。參閱受禮三十二年後（1754）孔傳鐸子孔繼汾的已刊刻出版的文字紀錄，¹³ 提供另一被疏忽的重要遺失，是安在花瓶內的「松竹梅花」二樹（圖 5）。或許就因為此遺失，唐麗把原承放花的花瓶稱為「觚」，誤認作「香筒」用。¹⁴ 同時，由於孔子博物館提供雍正帝畫琺瑯五供詳細目驗的機會，得以發現花瓶中有一有長方形洞的銅內膽（圖 6），是用以插入琺瑯松竹梅用的，其為花瓶，殆無疑義。

很重要的是，《闕里文獻考》稱五件器座為「几」。不只詳錄尺寸，更對花瓶中花樹的組成數量、質材及尺寸等，比造辦處的紀錄更詳細。使我們得知花樹（高二尺）比瓶（高一尺八寸九分）還高，是琺瑯作的，計松花 180 朵，竹葉 60 片，梅花 120 朵。而所失的座比花樹更高，為二尺九寸八分（即 95.36 公分）朱漆金飾的「几」。可惜孔家對雍正帝禮物的詳錄只有文字，圖像則闕如。留在孔府文物檔案館孔傳鐸手寫稿《闕里盛典》，有預留圖繪的版面，但卻空白，看來圖並沒有完成。未知是否有進呈朝廷的完整版否？¹⁵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4，頁 104；冊 5，頁 575。

12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6·琺瑯器（二）》，頁 74-75，圖版 222-225。

13 《皇朝文獻通考》即有孔繼汾（1721-1786）乾隆二十七年（1762）序的《闕里文獻考》，記錄一份世宗憲皇帝欽頒清單吻合如下：「琺瑯銅香鼎一燭臺二花瓶二內安松竹梅花二樹香盒一金龍朱漆几五帛籠七銅爵二十六登一銅六簠二十一簋二十一簋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蓋。」（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卷 74，頁 24。（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卷 22，頁 498、510、508。

14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楊伯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0·金銀玻璃琺瑯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58-208，圖版說明頁 90-113。

15 「雍正八年九月十六日杜保疏奏，自起工以至告竣之日，備悉開造，交與衍聖公孔傳鐸，次第

所幸，不只五供器物本身，就連今日已失傳的「金龍朱漆几」（圖7）與「琺瑯松竹梅」（圖5）兩部分，在稍晚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的《乾隆曲阜縣志》中，皆留下線繪刻版。¹⁶

就「琺瑯松竹梅」部分，雖然並未如實圖繪出文字所記錄的松竹梅完整數量，但已是現存最早的圖像紀錄。該書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潘相以琉球學教習期滿之進士，奉旨以知縣用。¹⁷他以曲阜知縣，在雍正帝送琺瑯禮物給曲阜孔廟的四十二年後，為之作了不少止於文字的圖像紀錄。

另外，2001年Musée Albert Kahn出版了1909至1934年在中國拍攝的圖檔集中，呈現曲阜孔廟在大成殿的五供陳列實況，包括漆几及石座（圖3）。¹⁸但透過與乾隆時十八世紀的紀錄比較，此二十世紀初曲阜孔廟大成殿的陳列已缺乏花瓶中的琺瑯松竹梅花樹。

以上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相關圖像及文獻之助，以接力的方式，可助我們較趨向完整重建琺瑯禮物的整套圖像。我們也可了解，此琺瑯五供，在禮物群中，不只以其質材與高大而凸顯，尺寸分別為71、70.5、72公分。¹⁹再加上松竹梅琺瑯花，及「座」、「几」，五供在大成殿中，體型是相當高大而壯觀的。依孔繼汾、潘相的尺寸紀錄，度量衡換算（表一），²⁰重建如圖示（圖8）。

畫琺瑯五供（圖8），較之禮物中銅簠、簋（圖2）等的無座、几花樹等，尤其特別。顯然五供不像其他，可陳列在受禮者的原香案中，以新祭器取代舊有的即可。送禮者似已考慮到五供是受禮者祭祀空間的新元素，因此器物的几與座及器上花樹皆一併設計。感謝孔子博物館惠允實物觀察，發現燭台、花瓶與鼎三銅足中，皆有穿透的橫穿，疑皆用以固定器與几的牢固關係（圖9）。「其孔廟香几石座，路

編纂，彙輯成書，進呈御覽，欽定書名，刊刻頒布，光昭盛典。奉旨依議。」（清）杜詔、岳濬，《山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1之4，頁67-68。

16（清）潘相等纂修，《乾隆曲阜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輯73，卷9，頁9。

17（清）梁國治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40，頁25。

18 Musée Albert Kahn, *Chine, 1909-1934: Catalogue des photographies et des séquences filmées du Musée Albert Kahn* (Musée départemental Albert-Kahn, 2001).

19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6·琺瑯器（二）》，頁74-75。感謝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提供數據如下，香爐：通高70公分，口徑36公分；花瓶：通高70公分，口徑23公分，燭臺：通高70公分，上盤徑13公分，下盤徑30公分，二種高度皆將足下銅條計入。

20 丘光明編，《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遠難去，著本處做，如本處不能，再令石匠前往彼處辦做。欽此」²¹（圖 10），足以明證。

造辦處雍正八年（1730）九月十八日檔案，透露了日理萬機的雍正帝，對此禮物從主體到附件到藝匠、質材與物的流通及運送方式之細緻考慮。甚至連禮物的附件，在禮物完成後，將做世紀性移動時，由於石質甚重，更關注到石藝匠，是否就地或由京城移動到曲阜的問題？同時也說明附件在贊助者心中對禮物的重要性。它們更牽涉到物在祭儀中如何放置，如何與其他器群共現在祭儀中，成為祭儀的重要元素問題，詳後論。

因此，雍正帝的畫珐瑯五供，一如八月八日雍正帝在文廟告成對孔子的告祭文中自謂：「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授。」²²不只祭告文如此說，造辦處檔案也如是反映。

（二）畫珐瑯五供的風格

雍正帝「親為指授」的五供風格為何？五件皆有「雍正年製」。香爐在器底（圖 11），雙藍框及藍料落款；燭台在最底層，黃地紅料款，有藍料夔文邊飾長方框（圖 12）。花瓶的藍料夔文框紅料款「雍正年製」（圖 13），亦與燭台近似。這種藍料框紅料款及楷書年款寫法，與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珐瑯穿帶盒器底落款（圖 14）書寫風格近似，說明是雍正年間的成品。

就五供的質材、器類與功能而言，一香爐、二燭台、二花瓶的五供組合，對接受禮物的一方來說是鑿空的。銅胎畫珐瑯正是清宮康雍乾等朝接力發展出來的新工藝類別。²³就形制而言，如此大型器，在清代康熙朝畫珐瑯器中是罕見的，²⁴在成形技術上必然是挑戰。感謝孔子博物院提供香爐三足與器身分開成型的圖像證據，顯示足部上有突出的榫卯，是用以接合器身的（圖 15）。這種一器分成幾部分，再接合的現象，在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珐瑯器中多所例證，康熙年製款的冰梅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頁 580。

22 （清）高宗御製，《世宗憲皇帝聖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10，〈聖廟告成祭文〉，頁 21；（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三）》（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 99，雍正八年十月，頁 24。

23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珐瑯》，頁 40。

24 張瀚予，《清雍正朝銅胎畫珐瑯器研究》，頁 128，表五。該論文亦注意到畫珐瑯五供大型器的成形問題。

紋五供（圖 16），²⁵ 其上下承盤、燭台與燭杆皆分開成形，燭杆上下各有分開的卡榫，以穿過上下承盤及燭台的中間孔洞（圖 17）。該燭台高僅 10.6 公分，已分成四部分成形，其四層各露出金屬口沿與足沿。這種銅胎鍍金的分層手法，亦見於雍正帝銅胎畫琺瑯五供，香爐有五道；燭臺有十道；花瓶有九道。同時，香爐的附件雙耳、花瓶的雙龍形耳，皆有銅胎鍍金沿邊。基於雍正帝的畫琺瑯五供高皆在 50 公分以上，香爐足部與器身分開成形的現象推測，這些上下層露胎鍍金的分層沿邊，不無可能即是分層成形，層與層之間的相互接合處？這些推測因僅隔櫥窗觀察，有賴進一步更完整實物目驗及儀器檢測以修正。

就胎體及技法而言，雍正帝畫琺瑯五供是在紅銅胎上畫上琺瑯釉上彩繪的，更是文廟祭器系統前所未見。燭台釉彩剝落露胎處（圖 18）顯示，其銅胎甚薄，不無可能是敲擊形成。其釉層的堆積似乎比銅胎厚些。

就紋飾題材而言，不只香爐口沿上的纏枝蓮花（圖 19），這種深具佛教意涵的圖案，就連遍布器身的主要題材牡丹，皆是闕里釋奠祭器前所未見的。大面積上的較大型牡丹，包括分布在香爐的腹部（圖 20）、燭台座上、花瓶的頸、腹等，以及較小型面積上的較小型牡丹（圖 21），包括香爐足部、圈足、燭台的上下盤、花瓶的頸、腹、圈足間及上下轉接處較窄的裝飾層上等。如香爐腹部彩繪五朵盛開的紅色牡丹，間飾藍色小花、綠葉纏枝圍繞（圖 22），類似的黃地粉紅牡丹題材，在康熙朝及雍正朝的銅胎畫琺瑯器不乏例證，如康熙御製銘的「銅胎畫琺瑯黃地牡丹渣斗」（圖 23）、「銅胎畫琺瑯牡丹紋方壺」（圖 24）是為例。

就色彩而言，其單一牡丹花，除單色包括粉紅色（圖 25）、藍色（圖 26）、綠色（圖 27）、紫色（圖 28）有深淺不等的色階變化外，有些單一花朵往往也有不同色調，如藍色、綠粉色等相間（圖 29）等。伴隨著的纏枝葉，強調翻轉的綠色或藍色之個別色階變化（圖 30），視覺效果上共同呈現對顏色色調變化的興趣。如此豐富的色彩，不只在孔廟祭器系統的色彩上，是鑿空的；在清宮琺瑯彩釉料與技術的掌握上，更是向西方學習中發展出來的。據研究，清宮真正初步燒成銅胎或瓷胎畫琺瑯，可能已在康熙五十年（1711）之後，²⁶ 雍正朝造辦處檔案顯示，清宮造辦處從明代掐絲琺瑯已發展的基礎上，更轉而對琺瑯釉色豐富多彩顏料及技法的研發與掌握。此外，早有研究指出，五供以黃色琺瑯為地，黃色是只有皇帝始能使用的

25 侯怡利主編，《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33。

26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 285。

色彩。

康熙色地彩繪作品中，以黃色地彩繪為主流，黃色地是歐洲畫珐瑯作品極為少見的，黃色地作品或許可以說是清宮畫珐瑯的重要特點，表現出皇家的富麗氣息，黃色即代表帝王，是重要的統治象徵。²⁷

雍正帝五供皆為黃地，這是清初自康熙帝以來皇帝所認為獨屬皇帝的色系。²⁸不只康熙帝時早已如此認為，既有上古經典的證據業已提出，見於乾隆皇帝時所出刊康熙帝在日講課中親自研讀的禮記講義，²⁹康熙帝更不准皇太子擅用黃色之例，收在聖訓中。³⁰但康熙帝卻在康熙二十三年親訪曲阜孔廟時，留下只有皇帝才使用的黃蓋。康熙帝正以皇帝用物及色彩，顯示皇帝送禮禮敬孔子的方式。此皇帝以黃色禮敬孔子的特色，顯然為雍正帝所踵繼。雍正帝在曲阜孔廟於雍正二年火燒，大成門詔用黃琉璃，³¹以取代原先的綠琉璃。雍正帝以黃地畫珐瑯五供送給曲阜孔廟，以皇帝的色彩禮敬孔子之用意，³²似可以類推。但是這種五供黃地的選用，若是針對受祭者而言，孔子，是禮物的原始受祭者嗎？

四、「物」與「人」的交錯與網絡——贊助者、製造者、接受者、受祭者及禮物在紫禁城與闕里間的世紀性移動

（一）雍正帝送給曲阜浴火後孔廟重建的新祭器

2005年公布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等紀錄顯示，禮物從風格、製作單位、到運送人選與方式等，皆是雍正帝親下指令，經相關承辦官僚單位與藝匠

27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珐瑯》，頁47。

28 施靜菲已注意到此現象，見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珐瑯》，頁47。

29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乾隆十四年（1749）出刊康熙帝日講課時研讀的禮記。（清）康熙年間敕編；乾隆元年敕校，《日講禮記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8，頁20-21。

30 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二月庚戌康熙帝的上諭中，更訓誡皇太子不准逾越，用黃色。「昔立允初為皇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職是之故，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清）雍正九年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4，頁13。

31 （清）杜詔、岳濬，《山東通志》，卷11之6，頁24。（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30，頁33。（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13，頁227；卷14，頁317。

32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奏銷檔》185-085-1。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珐瑯技術的互動〉，頁318。

合作的結果。

1. 兩套文廟供器：照「壽皇殿的珐瑯供器」與「銅簋銅牌樣」

有關曲阜孔廟大成殿得到雍正帝的御賜，《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有較具體而詳實的紀錄，是始於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親下旨令，經內閣大學士張廷玉（1672-1755）、蔣廷錫（1669-1732）傳雍正帝旨，要養心殿造辦處造照「壽皇殿供的珐瑯供器」一分，文廟試供（圖 31），³³ 為皇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禮物祭器，在風格及質材上定調。據研究，這一年造辦處的工作量達到雍正年間的最高值。³⁴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珐瑯供器文廟試供正文下，另附有八行小字，一部分提到珐瑯供器製作的時間及送赴文廟人選。所謂「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做得『黃地珐瑯五供』一，由員外郎滿毗交翰林院學士吳拜，³⁵ 廣儲司司庫李之綱，請之送付文廟」。

另一部份附文，實涉及珐瑯供器之外的另一套「文廟供器」，即銅祭器，須交付不同單位承造，顯示內廷造器依質材而有單位分工現象。雍正八年（1730）一月十一日，「為作『文廟供器』事，郎中海望啟莊親王奉……將銅器交廣儲司；竹器交營造司成造」。³⁶ 就在今日，「司庫張秉義將原交來登、爵、銅、簋、簠、豆合牌樣六件，³⁷ 帛匣木樣一件，匣樣尺寸印譜一本，送至大人衙門交主事阿東阿收訖」。³⁸ 看來雍正八年一月十一日下旨成造單位時，已附上業經核准的文廟銅銅簋等牌樣。

雍正帝為曲阜孔廟大成殿新制兩套祭器，珐瑯五供照「壽皇殿供的珐瑯供器」，銅祭器則依「登、爵、銅、簋、豆合牌樣」。銅祭器在雍正七年底到八年

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頁 67。

34 張學諭，〈技藝與皇權：清宮造辦處的歷史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6），頁 77。

35 曾任造辦處司庫，雍正七年（1729）陞任員外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頁 434，「雍正七年正月初四日雜錄」；朱家潛，《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 148；陳國棟，〈怡親王允祥與內務府造辦處〉，收入余珮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瑯彩瓷》，頁 27。

36 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日封十六阿哥允禩承襲莊親王爵。（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4，頁 4。

37 張國忠曾孫。張國忠為正黃旗包衣，旗鼓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清）乾隆九年敕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75，頁 17。

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頁 104。

(1730) 初，已得到雍正帝的樣式欽定，下旨相關有司，進入製作程序。此質材與樣式的裁定，皇帝顯然事必躬親，而且也認為很必要，一如皇帝向孔子在告祭文所強調。而使用質材造器的方向與目的，或許與雍正七年雍正帝派通政使留保前去闕里督工於三月的奏請有關，詳參餘論。

2. 慎選與更動送赴人員

其實，《內務府奏銷檔》訊息顯示，孔廟懸匾對聯與供器，在雍正十年三月十二日完成，是比《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稱琺瑯供器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稍早。此供器應是指銅簠簋等吧？三月十二日當天，海望已上奏，並奉旨派翰林一員、內務府官一員齊送。³⁹ 海望在隔日，亦因翰林院一員既由內閣指派，至於內務府者，再奏請王大臣指派，決定色爾特。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此檔案目前僅公布滿文檔。唯會觀查核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內閣大學士鄂爾泰奉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旨《奏銷檔》漢文檔，⁴¹ 以及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四日《造辦處檔案》，這種由滿文公文到漢文公文的改變，會透露出雍正帝指派赴闕里人員的細緻變遷。指派送禮物去文廟的人選改變了。翰林院即派學士吳拜，內務府則派廣儲司的李之綱。顯然，李之綱取代色爾特前行曲阜。查李之綱曾參與雍正帝時的多種出版，包括《御選唐宋文醇》《御定子史精華》、《御定駢字類編》、《御定音韻闡微》《日講春秋解義》⁴² 等；相對地，色爾特則是八旗中被選為雍正七年己酉科德新佐領的滿洲人。⁴³ 或者李之綱是更具文史修養的內務府官員吧？臨時換將，豈為了更慎重其事？

3. 欽定水道運送，以免褻越

在銅簠簋等完成的五天後，琺瑯供器做好的前七天，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雍正帝且對造辦處呈奏孔廟匾額、對聯與琺瑯供器告成時的運送問題下指令，不取

39 (清)海望，《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 300，〈奏為孔廟匾對供器等咸造迄派員賚送事摺〉，雍正十年三月十二日，頁 475，編號 87。感謝賴惠敏教授告知，王健美翻譯滿文。

40 (清)海望，《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 5，〈奏報敕建孔廟挂匾等物做成請派員賚往片〉，雍正十年三月十二日，頁 68，編號 15。感謝賴惠敏教授告知，王健美翻譯滿文。

41 (清)鄂爾泰等，《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 300，〈奏為派員賚送孔廟匾對供器等事摺〉，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頁 478，編號 88。

42 (清)乾隆三年敕編，《御選唐宋文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校刻諸臣職名〉，頁 2；(清)吳士玉、吳襄等奉敕撰，《御定子史精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監造諸臣職名〉，頁 4；(清)吳士玉、吳襄等奉敕撰，《御定駢字類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監造諸臣職名〉，頁 4；(清)李光地等奉敕撰，《御定音韻闡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職名〉，頁 2；(清)庫勒納、李光地等奉敕撰，《日講春秋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銜名〉，頁 4。

43 (清)乾隆五十一年敕撰，《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109，頁 14。

陸路，恐沿途捧持，致多褻越。皇帝選用禮物運送的方式——水道，⁴⁴ 以表示對祭祀者孔子的尊敬。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孔廟匾額、對聯、珪瑯供器等，若由陸路運送，恐沿途捧持，致多褻越，如有水道，可以載往，實屬允協。⁴⁵ 在執行上，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鄂爾泰奏銷檔進一步安排細節，包括運送者、禮物迎接者，從可用水道到沒有水道可用的三十里陸路，皆成為上奏的內容，顯見對此事的慎重：

孔廟匾對供器等件，臣等擬派翰林院侍讀學士吳拜、內務府司庫李之綱，由水路僱覓民船，前往齎送。內務府將匾對等項，敬謹包裹。抬送至通州，安置船上。由通州運河大路抵濟寧，過天井關，入府河至兗州府城東十里，去曲阜僅三十里，令地方官虔設綵亭，知會衍聖公孔廣榮，令其親赴舟次，恭迎進廟，敬謹將匾額懸掛。次日孔廣榮行家禮告祭，陳設祭器，以新聖典。

奏報內容更包括交吳拜內務府庫銀四百兩支付水腳包裹等費。⁴⁶

雍正帝用以祭拜曲阜孔子的祭器，雍正年製款的畫珪瑯五供及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的銅簠簋，在綿密的路程規劃下，在紫禁城與闕里間，在雍正十年完成其世紀性的移動。

十年雍正帝選擇以水道運送高大尊貴的禮物祭器，避免沿途捧持至山東曲阜孔廟，以向孔子致敬。六十年後，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代表英皇使臣為乾隆帝祝八十壽辰，亦以所攜帶的禮物「體積過大，機器靈巧，從廣州長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損傷」，由東印度公司董事長致信兩廣總督，懇祈乾隆皇帝批准，人員到達天津或鄰近口岸時，予以適當接待。⁴⁷ 顯然，清雍乾時期運送貴重的大型物品，水運是首選。

聖廟重修告成，雍正帝即以「簠簋樽罍，選良工於內府，晶瑩黃瓦，準制度于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頁575。

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頁575。（清）本岱等，《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300，〈奏為大阿哥赴山東祭孔廟用過車輛銀兩數目摺〉，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頁90，編號19。

46 （清）鄂爾泰等，《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300，〈奏為派員齎送孔廟匾對供器等事摺〉，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頁478，編號88。

47 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19-20。感謝杜正勝教授告知。

宸居」祭文祭告孔子。⁴⁸

(二) 曲阜孔廟釋奠祭器史上的鑿空之作：畫珪瑯五供

接受禮物的曲阜孔家，對禮物有何反應？雍正十年（1732），接受皇帝禮物的衍聖公為孔子七十代孫孔廣燾（1713-1743），時年近二十，隔代承爵，雍正九年始襲衍聖公。⁴⁹其祖父孔傳鐸（1673-1732），曾輯有《闕里盛典》一書，感謝孔府文物檔案館惠允查證部分手寫稿，知該書正及時記錄此套皇帝禮物，並詳錄雍正帝祭器禮物清單。當時孔家衍聖公孔傳鐸對禮物的鑿空質材，透過蘇恭的「琅玕，琉璃之屬」的理解，追溯到《爾雅》、《淮南子》、《山海經》等論述，以為這種來自西北或崑崙山的宇宙珍寶，經尚方監造，讚嘆其「工巧殊常」。孔傳鐸的考證，顯然為潘相所沿用。⁵⁰

可惜目前孔府只公布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為《闕里盛典》所做的序文，⁵¹彰顯雍正帝的尊儒。但目前學界尚未刊行此書。相對地，六十九代孫孔繼汾（1721-1786）的《闕里文獻考》則經進呈御覽刊行，前有衍聖公孔昭煥乾隆二十七年（1762）序。值得注意的是，《闕里盛典》、《闕里文獻考》對「世宗憲皇帝欽頒的祭器」，關於銅簠簋銅豆等，僅援引經典考證，但特別是針對雍正帝下旨檔案中所稱「五供」詞彙，闕里並未沿用。唯孔傳鐸仍溫和地分稱「香爐」、「花瓶」、「蠟台」。但孔繼汾在孔家接受禮物約四十年後，不只沒有以造辦處檔案所指稱「五供」的概念論述此群器，其雖避免對此器群之前所未見作直接論述，僅在針對個別器物類別作一般說明，如稱「花瓶」二、「燭台」二。最凸顯的是，不僅不稱「香爐」一，而僅稱「香鼎」一。顯示以孔繼汾為代表的闕里與雍正帝對五器認知的分歧。尤其明顯的是，針對「花瓶」，稱其「非古制」；稱「香鼎」為「焚香器也」：

「考三代以上無上香事，自漢始有香爐之名，然祇用以薰衣服，備儀衛而已，後世遂因以祀神焉」（圖 32）

至於針對其「黃色瓷質銅胎彩繪花卉」，則稱：

48（清）世宗，《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18，〈聖廟告成祭文〉，頁 6。

49（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 8，卷 110，雍正九年九月壬戌，頁 458。（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 74，頁 20-24。

50（清）潘相等纂修，《乾隆曲阜縣志》，卷 9，頁 5。

51 山東大學歷史系、孔令仁等，《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 3·清代檔案史料·3·公府組織與職掌（上）》（濟南：齊魯書社，1988），〈闕里盛典序〉，頁 20-21。

「舊存銅鼎皆飾饗饗龍文」。⁵²

孔繼汾以其精於考據，對禮物五供在器類上、及紋飾、質材上的悖離三代傳統部分，率直直書。該書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衍聖公孔昭煥序，談及是上呈乾隆帝御覽的。但在乾隆五十年（1785），其《孔氏家儀》卻興文字獄案。⁵³

確實，孔繼汾以「鼎」稱「爐」，以及銅質材為主的態度，在較早的一本康熙三十年（1691）有關闕里的《文廟禮樂考》，為附有禮器圖錄的文廟禮樂器書籍已出現。就質材而言，大部分禮器主要是「範金」（銅質），間有陶質如太尊，木質如俎等。在器類方面，其雖然也有燭台，也有近似圓腹三足器，卻被稱為「鼎」。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件是珐瑯質材。當然，更沒有「花瓶」或稱為「香爐」之類的。除了少數的漆器、陶器、木器外，銅器是主要的，整群器則以銅器的色調為主。紋飾也以復古的饗饗紋、雲雷紋等為主，更沒有大型的纏枝牡丹牡花，以及珐瑯豐富的色彩。⁵⁴

這種現象在孔家後代自參與明以來的闕里系列增補中已是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家將朱熹有關州縣釋奠祭器器制於古，有據及堅持銅質的看法引入闕里志系列，與明朝廷官方禮制變革中強調祭器用瓷等，⁵⁵ 形成凸出的分庭抗禮之局。

自南宋以來，朱熹為州縣祭拜孔子的釋奠祭器已建立十九種，並強調用銅。⁵⁶ 但從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佛塔附近出土鈎窯自名香爐，且有己酉（1309）年款（圖 33），⁵⁷ 英國大維德青花瓶（圖 34），⁵⁸ 銘香爐花瓶，至正十一年（1309）由

52（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 22，頁 507-508、510。

53 十三年二月上幸闕里，其引駕官孔繼汾以內閣中書用；十八年八月上丁上詣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皇上親詣行禮，現在戶部主事聖裔孔繼汾可否准其一體陪祀，奉旨准其陪祀。陳冬冬，〈乾隆年間《孔氏家儀》文字獄案〉，《歷史檔案》，2015 年 4 期，頁 128-131。孔勇，〈乾隆朝《孔氏家儀》禁案新探——基於禮儀衝突與官紳矛盾雙重視角的研究〉，《文史》，2017 年 4 期，頁 253-279。

54（清）金之植等編，《文廟禮樂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427-444。

55（清）張廷玉等，《明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47，頁 19；卷 136，頁 7。林堯俞、俞汝樞，《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82，頁 3。（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 14，頁 276；王光堯，〈明代祭祀用瓷研究〉，收入《中國古代的官窯與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56 陳芳妹，《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91-255。

57 岡田衛、相賀徹夫、相賀昌宏等編，《世界陶磁全集·宋遼金》（東京：小學館，1977），圖 103；李作智，〈呼和浩特市東郊出土的幾件元代瓷器〉，《文物》，1977 年 5 期，頁 75-77；余佩瑾，〈內蒙古元代窖藏出土的鈎窯香爐〉，《故宮文物月刊》，212 期（2000.11），頁 26-33。

58 岡田衛、相賀徹夫、相賀昌宏等編，《世界陶磁全集·宋遼金》，圖 49、50、51；黃清華、黃薇，〈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瓶考〉，《文物》，2010 年 4 期，頁 64-76。

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提供「香爐」、「花瓶」在元代用於佛、道脈絡的證據。元代湖南瀏陽文靖書院在朱熹強調的簠簋之外，加入瓶與爐（圖 35），⁵⁹顯然是對佛教系統香爐花瓶等有所反映。⁶⁰

《闕里志》從弘治十八年（1505）陳鎬作李東陽序徐源後序的最早版本，⁶¹以二十三種禮器圖（圖 36）開始，到孔家陸續增補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孔弘乾續修《闕里志》、則加入「鼎」與「燭台」（圖 37）；⁶²到孔胤植修《闕里志》（1609）（圖 38）則延續孔弘乾說法，不稱「香爐」，稱「鼎」。⁶³《文廟禮樂考》雍正致贈闕里禮物之前的祭器銅陶木禮器全稱為「禮器舊圖」，而在其前又圖繪「雍正十年欽賜瑤瑯銅器」及「乾隆三十六年欽賜周器」。⁶⁴但僅以黑白線繪版畫形式呈現，瑤瑯質材的質感及色感則闕如，而這些被個別羅列的單件之間，是否有組合關係，並未說明。雍正欽賜瑤瑯器等版畫繪刻圖像等，亦見於昭和八年（1933）臺南孔廟臺南以成書院發行的《聖廟釋奠儀節》。⁶⁵顯現在闕里系列中的流傳。

五、雍正帝畫瑤瑯五供的原始受祭者：康熙帝

雍正帝的畫瑤瑯五供，原創時的受祭者是孔子嗎？原來是新君雍正帝對先帝康熙帝的新創祭器，在新創的御容崇拜空間壽皇殿（圖 39）祭祀。

（一）壽皇殿供器與典型御容崇拜新空間的創建

有關壽皇殿的研究，學界多關注乾隆帝與壽皇殿成為清皇家御容崇拜空間的制度化關係，⁶⁶卻忽視雍正帝最早開始以康熙帝及生母孝恭仁皇后御容崇拜，而對明

59 陳建明主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80-181、184-185。

60 謝璿，〈元代釋奠祭器研究——以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祭器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 18-21、48-49。

61（明）陳鎬，《闕里志》，畫師安宗儉、刻手文景淳朝鮮刊本，（濟南市：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26-r。

62（明）孔弘乾續修，《闕里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三十六年應明德刻本影印），冊 23。

63（明）陳鎬纂修、孔胤植重修，《闕里志》（明弘治十八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4（清）金之植等編，《文廟禮樂考》，頁 427-444；（清）孔令貽，《聖門禮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71-82。

65 林海籌，《聖廟釋奠儀節》（臺南：臺南以成書院，1933），頁 168。

66 Jan Stuart and Evelyn S. Rawski,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of Art;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代已建的宮廷空間給以新詮釋，遂成為日後清皇室御容崇拜空間的始創情境。

事實上，壽皇殿是明萬曆始建的宮殿之一，明宮廷慶上元節，且在壽皇殿安放圓鰲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與乾清宮的七層牌坊燈等，⁶⁷ 扮演參與明宮廷上元節節慶慶典慶祝與場地。但壽皇殿此空間的功能，基本上已於清雍正帝時期重新詮釋。從順治帝與康熙帝移靈陵寢前的過渡停靈空間，成為雍正帝新創的御容崇拜空間，以御容追思康熙帝與生母孝恭仁皇后的特殊祭祀空間。壽皇殿之名，是在有關雍正帝的史料中，始特別凸顯的。唯當順治十八年（1661）二月二日，在滿漢文武官員伏地悲慟中號泣的康熙帝隨世祖章皇帝梓宮從乾清宮移靈奉安至壽皇殿之刻，⁶⁸ 壽皇殿已開始成為清國家文獻的重要紀錄內容。當康熙帝於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賓天後，⁶⁹ 雍正帝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丁酉令修壽皇殿，安奉聖祖梓宮。雍正帝否決大臣所建議的其他地點，終究選擇壽皇殿，理由是就近可常去以表孝思，同時又是對順治帝傳統的接續。⁷⁰ 說明原選擇壽皇殿，只是為雍正帝可就近常去康熙帝的暫時停靈處。

世祖章皇帝大事時，曾安奉於景山壽皇殿，朕意亦欲安奉於景山壽皇殿，庶得朝夕赴梓宮前親行奠獻。⁷¹

雍正帝在三年守喪早期，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釋服後，壽皇殿不只是六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從乾清宮奉移聖祖梓宮之處，⁷² 壽皇殿更在百日後，聖祖梓宮從壽皇殿移到景陵後，在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成為奉聖祖御容⁷³ 及平日圖書器用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張富強,《景山壽皇殿歷史文化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穆宗毅皇帝壽皇殿龕內供奉陳設檔》(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皮埃爾·綠蒂(Pierre Loti),馬利紅譯,《在北京最後的日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王柏中,〈清皇家內廟祭祖問題探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6期,頁60-63。

67 (明)呂毖,《明宮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頁7;卷2,頁19。

68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85,頁10-12、14-15、19、25、47-56、60、64、71、82。

69 (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頁4。

70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85,頁51。

71 (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1,頁9。

72 「在奉安前六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上行告祭,從苦次出望,見陳設祭品遂失聲大慟」。(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1,頁9;(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卷2,頁1;(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85,頁71。

73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6,頁36。

服御之物悉陳左右之所。壽皇殿被營造成聖祖御容之殿。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丙寅，雍正帝已請怡親王命莽鵠立圖寫御容並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戊寅畫成。雍正帝即命俟梓宮發引至時，將御容供奉在壽皇殿。⁷⁴

諭朕受皇考深恩，四十餘年，未嘗遠離。皇考升遐，無由再瞻色笑。今追想音容，宛然在目。御史莽鵠立精於寫像，昔日隨班奏事，常覲聖顏。皇考有御容數軸，今皇考年高，聖顏微異於往時，著莽鵠立敬憶御容，悉心薰沐圖寫。尋莽鵠立恭繪聖祖仁皇帝御容成。捧進於養心殿。世宗憲皇帝瞻仰依戀，悲慟不勝。命俟梓宮發引後，敬謹供奉於壽皇殿。至是親詣行禮，自後歲時奠獻，日以為常。⁷⁵

上文正說明雍正帝何以將壽皇殿，從暫時的停靈空間，轉化成清皇室永久性祖先御容崇拜空間的歷史情境。

確實，壽皇殿在雍正帝為生父生母之死，三年素服期間孝子形象的形塑扮演要角。它雖在雍正帝與康熙帝天人永隔間，它是雍正帝所創建出的父子情誼表達之私密空間，它更是新皇帝即位前後，與新政並行的三年守喪的各種重要儀式，皆在此展演。康熙帝梓宮奉移壽皇殿雍正帝未釋服前，雍正帝每日三次親詣獻食；一月內，日一次，親詣獻食；一月後，數日親詣一次。⁷⁶雍正帝甫成新帝，最常出現的地點之一是壽皇殿，雍正帝選擇作為「供奉皇考聖容之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朔甲午，聖祖仁皇帝賓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雍正帝上諭以安奉世祖的壽皇殿安奉康熙帝。十二月三日奉安告祭，上「望見陳設祭品，遂失聲大慟」。上諭令陳設先帝平日服御器用。「大行皇帝梓宮於壽皇殿，諸王大臣等合詞恭懇皇上節哀」，自後上未釋服之前，每日黎明，詣壽皇殿獻食三次；一月內，每日一次，親詣獻食，一月後，數日親詣一次。命八旗詳查孝行素著者以聞，自是每日黎明，親詣壽皇殿奠獻。甲子，上詣壽皇殿行月祭禮畢。上命俟梓宮發引後，供奉壽皇殿。⁷⁷元年三月丙午，聖祖仁皇帝梓宮發引。⁷⁸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皇太后駕

74 (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卷1，頁27、39。

75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46，頁22。

76 (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2，頁5。

77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酉命總理事務大臣速行修理景山壽皇殿。(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卷1，頁13；卷2，頁3-8、40；(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44，頁7；卷1，頁9；卷2，頁1、4。

78 (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三)》，卷5，頁24；卷6，頁1-2。

崩，二十六日亦奉安壽皇殿。⁷⁹

此後，壽皇殿經乾隆帝制度化，成為清皇室祖先崇拜中，在承襲自明代⁸⁰ 漢人皇帝的太廟與奉先殿的神牌崇拜⁸¹ 之外，嶄新的「聖容之禮」的國家新祭祀空間，載入《皇朝通典》中。⁸²

（二）從順治孝陵「石」五供（圖 40）⁸³、康熙帝「法藍」碗到雍正帝「畫琺瑯」五供

雍正帝畫琺瑯五供在壽皇殿出現，事實上是對明及清初皇陵祭器的五供沿襲與質材變革。清初皇陵供器，並未試圖改變明皇陵石五供制，⁸⁴ 而是接續。從關外盛京太祖高皇帝福陵、太宗文皇帝昭陵，皆採石五供制。⁸⁵ 但雍正帝為追思父王疇昔天倫之樂，緬懷叮嚀告戒之言，與誠親王允祉等記錄各條萃會成編雍正八年（1730）四月初一並序，所輯錄的《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則紀錄了康熙帝告示子孫以新制琺瑯碗因先帝未嘗用，以祭先帝的重要改變：⁸⁶

昔者喀爾喀尚未內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為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崗阿等處，立為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度供陵寢，朕始食之。即如朕新製法藍碗，因思先帝時未嘗得用，亦特擇其嘉者，恭奉陵寢，以備供茶。朕之追遠致敬，每事不忘，爾等識之。

顯示雍正帝以琺瑯五供祭拜康熙帝，其來有自。

雍正帝以畫琺瑯五供祭拜康熙帝，不只是康熙、雍正銅胎畫琺瑯工藝在清宮積極發展的成果，⁸⁷ 更是對明及清初掐絲琺瑯工藝的變革。雍正帝的銅胎畫琺瑯五

7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1，頁27-37。

80 （明）林堯俞、俞汝楫，《禮部志稿》，卷25，頁6；卷27，頁37。

81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卷45，頁1、5、14、26-27、45；卷46，頁6-20。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88，頁5、10。

82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卷46，頁20-32。

83 徐鑫，《大清皇陵私家相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57。

84 佛瓷供器從元三供到明五供有所變遷。張婧文，〈元明清組合式陶瓷供佛器研究〉，《中原文物》，2017年5期，頁115-122。明石五供的設置很大程度上出於這一時期統治者對佛教的痴迷，很可能是由於明成祖及後世皇帝對佛教及藏傳佛教的崇拜和信仰。王朝霞，〈明清帝陵中石五供的禮儀制度初探〉，《碑林集刊》，2014年20輯，頁204-213。

85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21，頁9、13。

86 （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47-48。

87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273-335；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頁9-112。

供，與臺灣故宮現存的康熙款的冰梅紋掐絲琺瑯五供（圖4、圖16）⁸⁸形成對比，與雍正帝「雍正年製」款使用於養心殿佛堂的五供（圖41）⁸⁹同為畫琺瑯一致。使我們更能了解雍正帝對「壽皇殿的琺瑯供器」風格的選擇。這種不同，是多方面的：雖然同為銅胎，但地紋色彩上已非明代以來掐絲琺瑯所常用的藍地，而是黃地；紋飾色彩上的豐富性已如前述。技術上已不再是明代已發展的掐絲琺瑯，⁹⁰而是康熙朝開始發展、雍正朝主力發展的畫琺瑯。主體紋飾不是冰梅紋，而是牡丹。牡丹不只在康熙款的琺瑯器已多見（圖23、24），康雍二帝且皆留下愛牡丹詠牡丹詩作，其中以康熙帝為最。他欣賞牡丹，以暢春園等地牡丹賦詩，共計五首。包括在牡丹豐富色澤中，為綠牡丹賦詩，獨占二首。⁹¹

雍正帝畫琺瑯五供，在花瓶的腹部、足部；或在燭台的頸部、座上的綠牡丹（圖42），是否也試圖以琺瑯畫藝表達康熙帝「牡丹有綠誠仙品」類似的詩情？

康熙帝也詠清晨新晴初雨後各種牡丹顏色與俯仰風情，共計三首；⁹²五供中或在花形上試圖表達出清晨含葩初吐、香凝金掌露？甚或暢春萬朵開時？或在顏色上表達「金絲雜綠英，色含潑墨發，氣逐彩雲生」？這種對牡丹花豐富色彩的禮讚，雍正帝也詠牡丹，⁹³他詩中所詠的牡丹，是舒奇彩的五色，一如配戴玉珮霞冠雙頰潮紅膩粉光的天女。

88 侯怡利主編，《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頁33。

89 香港藝術館編，《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7），頁240，圖138。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博士提供。

90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琺瑯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明代琺瑯工藝〉，頁26-27；〈清代康熙時期琺瑯工藝〉，頁92-93；〈清代雍正時期琺瑯工藝〉，頁142-143。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273-335；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頁9-112；胡櫨文，〈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36卷2期（2019.10），頁121。

91 「暢春園眾花盛開，最為可觀，惟綠牡丹清雅，迥常世所罕有，賦七言絕以記之。」「碧蕊青霞壓眾芳，檀心逐朵韞真香，花殘又是一年事，莫遣春光放日長。」〈綠金蓮花〉：「牡丹有綠誠仙品，幻色生香野草中，數朵乍開凝碧玉，花應遜碧花叢。」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清）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44，頁9；卷35，頁7。

92 〈詠各種牡丹〉：「晨葩吐禁苑，花蒔就新晴，玉版仙蕊，金絲雜綠英，色含潑墨發，氣逐彩雲生，莫訝清平調，天香自有情。」〈憶暢春園牡丹〉：「曉雨疎疎薄灑，午風習習輕吹，忽念暢春花事，正當萬朵開時。」〈蓮花岩松牡丹〉：「離宮初雨後，花氣滿天街，石壁流泉響，松坪古幹佳，香凝金掌露，名重玉盤釵，靜裏經聲息，方知道有涯。」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清）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3集，卷46，頁7；2集，卷50，頁5；4集，卷33，頁3。

93 〈詠牡丹〉：「酣艷枝枝五色妝，難將蘭麝與論量，欲留春住舒奇彩，獨擅嬌多領眾芳。天女霞冠簪寶髻，仙姝玉佩曳霓裳，瓊漿飲罷瑤池宴，雙頰潮紅膩粉光。」（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25，頁15。

雍正帝畫琺瑯五供的粉色、紫色、藍色、綠色、複色系列，似與父子詩文的顏色描繪相輝映，似在壽皇殿祭器祭儀中交流。更是康熙朝廷已試圖從西方琺瑯釉料學習發展到雍正朝從「外造之氣」建立「內廷恭造之式」⁹⁴過程中，中西釉色研發⁹⁵的傑作。

從花瓣不同的開花程度到花瓣與花蕊關係之花蕊顯露不同程度，在細緻研發的畫琺瑯釉色描繪中，顯示出五供中牡丹花形多樣。從寫實（圖 43）到稍圖案化（圖 44）到圖案化（圖 45），甚至花蕊形狀的誇飾化（圖 46）。似乎也試圖表達出康熙帝牡丹詩意中「清晨含葩初吐」、「香凝金掌露」？甚或暢春園牡丹萬朵花開時的多樣風情？如此五供中的花瓶以及松竹梅琺瑯花樹，供奉在壽皇殿中，是否也表達了康熙帝曾詩詠的「花瓶」？

擷取群芳置案頭，天香一段貯清幽，人生常有悲歡事，惟爾閒情不曉愁。⁹⁶

六、試論畫琺瑯五供意象的位移現象

雍正帝何以將壽皇殿畫琺瑯五供意象位移到曲阜孔廟，並稱「試供」？雍正帝只下命令，但未留下直接的解釋之詞，本節從贊助者歷史情境，試圖提煉出理解的可能視角。

雍正帝在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旨壽皇殿畫琺瑯五供文廟試供，這種從雍正帝為康熙帝營造的御容崇拜空間，到祭拜孔子的儒家祭祀空間的位移，不只是簡單的地點轉移，也是祭祀對象的轉換，更是闕里祭器傳統的新因素移入。值得注意的是，下令製造闕里祭器的時間，正在皇帝本身於雍正七年九月下令《大義覺迷

9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頁 646；張榮，〈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 1 期，頁 80；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 305。

95 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十日，怡親王交西洋琺瑯料：月白、白、黃、綠、深亮綠、淺藍、松黃、淺亮綠、黑；舊有西洋琺瑯料：月白、白、黃、綠、深亮藍、淺藍、松黃、深亮綠、黑；新煉琺瑯料：月白、白、黃、淺綠、亮青、藍、松綠、亮綠、黑。郎中海望收在造辦處作樣，俟燒玻璃時照此樣。著宋七格到玻璃廠，每樣燒三百斤用，再燒琺瑯片時背後俱落記號，西洋人說燒琺瑯調色用多爾那門油，著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如有俟話用小琺瑯片時即用此油。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頁 99-101。

96 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清）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2 集，卷 44，頁 9-10。第二集收錄康熙帝康熙二十三至五十年作品。

錄》發行⁹⁷的兩個月後。此書所涉及的内容與議題，康熙關係與孔廟失火正是其中二大重點。該書内容重點之一，在上諭與口供對應表之間，康熙帝之死及雍正帝與康熙帝帝位傳承關係，還有繼康熙帝半年後駕崩的雍正帝生母之死，背後所意涵的母子關係等議題，顯然為民間所關注，也成為雍正帝上諭說明的重心之一。曾靜的有關康熙帝崩駕，雍正帝登基的父子關係問題所顯示的民間說法是：

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

以及有關半年後親身母后亦崩駕的母子關係說法：

隨將允禩調回囚禁，太后要見允禩，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上撞死。⁹⁸（圖47）

實與雍正帝的說法形成相當大的反差：

屢蒙皇考恩諭，諸昆弟中，獨謂朕誠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來，備盡孝養，深得母后之慈歡，謂朕實能誠心孝奉，而宮中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順之子，皆為母后稱慶，此現在宮內人所共知者。⁹⁹

雍正帝更以《大禮記》注宣示曾靜，而供詞提及皇上為聖祖仁皇帝即母后素服齋居三年，敬天法祖，至人至孝至成至敬，與天，與聖祖，一而二，二而一。所謂仲尼日月也。¹⁰⁰

此外，曾靜亦有關於曲阜孔廟失火問題的民間理解。而對此有「孔廟之不戒於火」、「此為人君之不德所致」說。¹⁰¹雍正帝不只以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孔廟大成殿上梁之前二日，慶雲現等祥瑞說，¹⁰²以代民間之「斯文厄運」說，更讓曾靜在口供中說出「治定功成，祥瑞自然協應」。「惟我朝聖祖皇帝得

97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駕崩，兩三個月間，乾隆帝查禁該書。（清）王先謙，《東華續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臺北：大通書局，1984），〈乾隆朝〉，卷1，頁15。

98 《大義覺迷錄》記載胤禩將康熙遺詔中傳位十四皇子的「十」字改為「于」字，以及謀殺康熙，逼死太后的傳聞。（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清雍正間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3，頁34b；馮爾康，《雍正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99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頁15、18。

100（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卷2，頁63。

101（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卷1。頁46。

102（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267，頁9。

堯舜、孔子之心傳……。我皇上以天之聰，……其於堯、舜、孔子之道，合聖祖家學精蘊而久已集其大成」。¹⁰³ 雍正帝與聖祖與堯舜孔子之集大成形象，雍正帝對聖祖與母后至誠至孝形象，正透過雍正帝的上諭與口供，透過《大義覺迷錄》發行，四卷，形式上包括上諭十道、審訊詞、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口供三篇，並附曾靜〈歸仁說〉一篇刊行後，頒發清帝國府、州、縣學宮，每月朔望與聖諭齊講解，違者論罪，¹⁰⁴ 顯示皇帝將清帝國子民規劃為讀者。

書中強調的素服齋戒為父母守喪三年的雍正帝，他將用力發展的畫珪瑯五供，在其營造的獨屬他對康熙帝崩逝後的御容崇拜空間祭祀，特別在康熙帝相關喪儀舉行間，壽皇殿成為最有關係的地點之一。雍正帝在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旨壽皇殿畫珪瑯五供文廟試供，在《大義覺迷錄》出刊兩個月後，雍正帝更透過畫珪瑯五供意象的由祭祀康熙帝位移到孔子，何嘗不是雍正帝的孝子形象與康熙帝及儒家連結關係之另一展示於眾的方式？雖然在守喪初始時，每日進出壽皇殿的雍正帝，當近臣勸其隔日再去時，他的回答是出於至情至孝，「朕非強飾以取孝名」。¹⁰⁵

餘論：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祭器對乾隆帝制禮的影響問題

比起乾隆帝的查禁《大義覺迷錄》，處死曾靜等，大改其父的政策，¹⁰⁶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畫珪瑯五供及銅簠簋等，在乾隆帝的系列復古制禮中，包括乾隆己卯（二十四年，1759）御製序的《皇朝禮器圖式》文中有「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等，是否有影響？答案是肯定的。其影響的力道，不是一如學界所忽視，甚或只是含混其詞而已，銅簠簋等，更成為乾隆帝的禮制復古改革的先驅。

（一）釋奠祭器史上的五供：中央與地方

雍正帝將與佛道系統淵源更深的五供送給曲阜孔廟，對清國家禮制有影響嗎？雍正朝《大清會典》至雍正五年（1727）為下限，¹⁰⁷ 其文廟陳設圖（圖

103（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卷2，頁65。

104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362。

105（清）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4，頁19。

106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62。

107《大清會典·雍正朝》有雍正帝在雍正十年十月七日序，稱康熙朝大清會典起於崇德元年迄於康熙二十五年，雍正朝者，援引蔣廷錫之請，開館纂修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清）允祿等纂修，《大清會典·雍正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4-1995）。

48)¹⁰⁸ 與康熙朝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為下限的¹⁰⁹ 文廟陳設圖(圖 49)¹¹⁰ 無異,並沒有出現五供,僅有香爐與燭台。可見從康熙到雍正五年止,縱使在國家文廟祭典中,並未明文規定使用五供。類似的現象亦見於從順治到康熙年間的闕里相關著作。¹¹¹

但相對的,從康熙開始(圖 50)¹¹² 到雍正五年止,¹¹³ 被列為大祀祀天園丘正位第一成陳設圖及告祭圖,則出現五供(圖 51)。也被保留在乾隆朝的《大清會典》(圖 52)。¹¹⁴ 必須關注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編纂的《大清會典》文廟祭典雖無五供(圖 53),¹¹⁵ 但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國子監則添設了乾隆帝頒賜的銅五供(圖 54),¹¹⁶ 是放在大成殿正中,承以石几,在香案之前,周范十器之後。¹¹⁷ 顯然,在清代國家祭儀中,康雍初期僅保留在祭天的大祀中的五供,但因雍正帝為浴火後的曲阜孔廟大成殿以獨特的畫珐瑯五供,因此在中祀中獨自擁有五供祭器。乾隆帝則以國家祭儀《皇朝禮器圖式》中遵守文廟祭器用銅的規定,將五供祭拜孔子的地點,由曲阜文廟更及於國子監文廟,但後者則是銅五供,且高度幾近畫珐瑯五供兩倍。因此乾隆朝的北京國子監文廟五供,雖是銅質,與其他銅祭器在質材上差別不大,但仍以其高大,五供的特別器制及功能,彰顯其特殊性。

必須更進一步關注的是,五供除因雍正帝與乾隆帝分別在雍正十年(1732)的曲阜與乾隆三十四年(1769)北京國子監文廟各具特色出現之外,在北京文廟出現七年後,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臺灣府文廟也出現了(圖 1a、c),距離雍正

108(清)允祿等纂修,《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91,頁 32。

109《大清會典·康熙朝》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開館纂修,御製序於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成。(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序〉,頁 8。

110(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4,頁 20。

111(清)張安茂撰,《類宮禮樂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順治十三年刻本影印),冊 271,卷 7 全。

112(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5,頁 2737、2763。

113(清)允祿等纂修,《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79,頁 4982。

114(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44,〈園丘第一成陳設圖〉,頁 14。

115(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45,〈文廟陳設圖〉,頁 30。

116 乾隆銅如意銜環耳瓶:口徑 34 公分、腹徑 165 公分、通高 105 公分;乾隆銅香爐:口徑 58 公分、通高 99 公分、通耳寬 94 公分;乾隆銅蜡扦台:口徑 192 公分、底徑 182 公分、通高 112 公分。感謝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117(清)梁國治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19,頁 41-43。

帝初創以五供祭闕里孔子的時間不到半世紀，距北京國子監受賜五供，只有七年。臺灣知府蔣元樞已將包括五供的銅祭器跨海運入臺灣，¹¹⁸ 釋奠祭器與政治的關係，在清帝國的君臣合作下，實為突出的例證。

（二）國家祭儀中的銅簠簋

五供雖在《皇朝禮器圖式》中缺席，雍正帝給曲阜孔廟的禮物，除琺瑯五供外，另一種禮物，銅簠簋等，對《皇朝禮器圖式》的形成，卻存在著被忽視的影響力。確實，這部分的禮物，從送出的十八世紀上半葉至今，往往只見文字紀錄，不像另一部分禮物畫琺瑯五供，如潘相、金之植的以圖繪加以流傳。今年孔子博物館陳列室首次展出部分文物，「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銘雍正八年（1730）的銅簠、簋、銅、豆、爵（圖 55）等，特別是簋的紋飾、形制及銘文等，與北京故宮「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的簋（圖 56）¹¹⁹ 在紋飾、形制及銘文的年份寫法等，皆極相近。這種曲阜、北京二簋製造年份及風格的相近性，是否說明兩地藏器製造來源的相關性？兩份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的紀錄，正與文物相互證明。

第一條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條由張廷玉、蔣廷錫傳旨照壽皇殿琺瑯供器要養心殿造辦處文廟試供條下，還有小字說明執行詳目，不該只注意到下旨中的主角琺瑯供器，而忽視了主項目下的細目陳述：「于八年正月十一日為做文廟供器事，郎中海望啟莊親王奉王諭，著交本衙門主事等將銅器交廣儲司」（圖 31）。¹²⁰ 可見雍正帝除下令為文廟作畫琺瑯五供外，亦作銅器等。是由莊親王代下旨令，於雍正八年（1730）初，令製作後交給廣儲司的。曲阜孔廟與北京故宮二簋上銘文所顯示的落款時間，正足以說明，旨令是在雍正八年年初所下，並可能在該年器物已鑄成。器上隨之明載「雍正庚戌年造」，推測是製造時間。

銅簠簋等的耗時及完成時間，與五供相近而略短。雍正十年（1732）三月十二日海望上奏滿文檔日，即是製造完成日並確定於十九日除派翰林學士吳拜外，內務府指派廣儲司李之綱送孔廟。¹²¹ 琺瑯五供與銅簠簋掛匾等得以會齊，一併送到曲阜

118 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進口的禮樂器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3 期（2013 春），頁 123-184。

119 感謝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學者吳曉筠及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文明告知訊息。

1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頁 104。

121（清）海望，《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 5，〈奏報敕建孔廟挂匾等物做成請派員賚往片〉，雍正

闕里。受禮方闕里孔繼汾的紀錄正是：¹²²

雍正十年世宗憲皇帝欽頒法琅銅香鼎一、燭臺二、花瓶二內安松竹梅花二樹、香盒一、金龍朱漆几五、帛篚七、銅爵二十六、登一、銅六、簠二十一、簋二十一、簠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蓋。

顯然雍正八年所造一百之十一件的銅器，是與雍正十年造成的琺瑯五供，一齊在雍正十年送達闕里。這種由莊親王承旨，在雍正八年造文廟祭器及件數事，也在以下第二條文獻的相互參證下被證實。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二十六日，莊親王允祿為「奏報造辦文廟祭器獻爵告竣派員送往」事。¹²³在《奏銷檔》中談及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奏尊旨成造的文廟祭器之前已成造過兩次，一為雍正九年由允祿尊旨成造一百六十一件，貯庫備用式樣六件；一為乾隆四年，亦由允祿尊旨造成有子若升配十一哲祭器八件，又添造銅十五件，兩次共成造文廟祭器登一件，簠二十二件，爵二十七件，豆九件，銅二十二件。

顯然莊親王允祿在乾隆十三年（1748）初的上奏中，正對此奏以前他所承旨成造的兩次文廟祭器作總結。此上奏不止說明雍正及乾隆朝的文廟祭器，皆由允祿承作。必須注意的是，允祿正是《皇朝禮器圖式》的總其成者——「總理禮器圖館事務」的和碩莊親王。該書乾隆帝序雖成於己卯（二十四年，1759），但書中每一器制圖繪引為定制的是「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並觀此奏銷檔上奏的時間，正是乾隆十三年（1748）。此年即是允祿將其在雍正九年（1731）及乾隆四年（1726）允祿曾承作文廟並提的上奏。原來，從雍正到乾隆年間，清宮壇廟銅祭器包括文廟簠簋等祭器的主要負責人是允祿。我們雖無法從只有文字沒有圖示的上奏知道允祿在雍正九年及乾隆四年承作的確切圖式如何？但現存文物，尤其是曲阜孔廟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的簠，與大清乾隆年款的北京故宮簠，及《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簠如此接近。曲阜孔廟的簠、銅、爵（圖55）等亦與《皇朝禮器圖式》（圖57）如此相近。從文物與文獻看，雍正朝雍正帝在曲阜大成殿火燒後所送的禮器中，五供雖沒有被收入《皇朝禮器圖式》，但乾隆帝在該書序中的「簠豆簠簋，所以事神明也，

十年三月十二日，頁68，編號15；（清）鄂爾泰等，《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冊300，〈奏為派員賁送孔廟匾對供器等事摺〉，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頁478，編號88。感謝賴惠敏老師提供資料，王健美協助翻譯。

122（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22，頁499。

1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內務府奏銷檔》，冊36，頁312-314。

前代以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此「古」是什麼古？是《西清古鑑》收錄上古銅器的古？《西清古鑑》不只沒有「銅」，其共有的「簠」、「簋」、「豆」（圖 58）等，¹²⁴ 基本器制雖相類，但《皇朝禮器圖式》的共通器類形制紋飾特點，與曲阜雍正款者更近似。難怪乾隆帝於乾隆十二年（1747）的諭對大清祭器的「悉用古制」的形成，即明白宣示受雍正帝頒闕里銅器的影響。乾隆帝在乾隆十二年已為大清國家祭典祭器下諭：¹²⁵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範銅為器，頒之闕里，俾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則朕思壇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亦應悉用古制。

此十二年的下諭，執行效率神速，十三年正月，相關單位已奉諭旨：

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自應悉用古制，一體更正。

《皇朝禮器圖式》的每一祭器圖式下，必隨之而來的「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圖 59），其來有自。無論是武英殿版或彩色版或如《備物昭誠》彩版等¹²⁶ 祭天地社稷的各色瓷祭器圖繪本，以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乾隆款的簠簋銅豆白瓷（圖 60）、¹²⁷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近日入藏的乾隆款等被定位為「皇朝禮器」的銅瓷器（圖 61），¹²⁸ 皆是現存具體的物證。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朝廷更下令曲阜文廟相關先聖先賢廟群跟進，而命山東巡撫造周公廟及四氏先賢祠祭器。¹²⁹ 這些文物與圖繪的視覺圖像，不只具體化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朝禮器圖式》序

124 查《西清古鑑》是梁詩正、蔣溥奉乾隆帝於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諭，十六年完成，四十六年所刊行的，從乾隆帝在《西清古鑑》的上諭中，標舉古物代表三代以上規模，仿博古圖遺式，功寄「鑑古」之遠思，並未強調《西清古鑑》與《皇朝禮器圖式》的關係，有關乾隆朝的青銅禮器改革等問題，請參考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3 期（2013 春），頁 123-184；吳曉筠，〈《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脈絡〉，《故宮學術季刊》，36 卷 1 期（2019.9）頁 115-149；吳曉筠，〈孔廟與乾隆祭器的設置〉，《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待刊）。

125（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75，頁 25。

126 Margaret Medley,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31, 1957-1959, 95-105；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 2 期，頁 70-79；Ming Wilson, "New research on the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album in the V&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8 (2005): 51-59。

127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125。

128 郭家彥（Lain Clark），《皇朝禮器》（*For Blessings and Guidance: the Qianlong Emperor's Design for State Sacrificial Vessel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9），頁 156，藍釉豆（18R7.4）、168 黃釉簠（18R7.6）、172 黃釉簋（18R3.8）、191 銅銅（17R8.7）。

129「是月壬子諭國家崇禮先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文廟祭器，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壇廟升馨薦享，亦既悉用古制矣」。（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 121，頁 38-39。

中所宣稱：「夫簋豆簠簋，所以事神明也，前代以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¹³⁰ 它們的簠簋等，不只是成為「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的典範，更與曲阜文廟保存的雍正帝禮物中的簠簋等如此相近。這些雍正庚戌年款的簠簋等，顯然不只是雍正帝對孔子告成文所說的「簠簋尊罍選良工於內府」，¹³¹ 更是乾隆帝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底十三年初，坦然告白的「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範銅為器，頒之闕里」、「朕思壇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亦應悉用古制」。雖然《皇朝禮器圖式》在質材上用銅多保留在文廟及城隍廟等系統，但所有國家祭儀中的各類壇廟祭器，無論銅、瓷、漆、木等質材，「悉用古制」定矣。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圖 62）簠蓋（圖 63）配「大清乾隆年造」款（圖 64）簠器身（圖 65），正為雍正帝的闕里銅禮物與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皇朝祭器改革關係，提供另一角度的物證。乾隆帝不只自述其古制與皇考頒給闕里銅器的關係，我們若細究乾隆帝形成其《皇朝禮器圖式》的乾隆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初，此期間，也正是他想親訪闕里到付諸行動的時期。乾隆十二年夏六月朔庚申，乾隆帝已心生訪闕里之念。¹³² 不到半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皇朝禮器圖式》「總理禮器圖館事務」的和碩莊親王允祿正奏稱「查得雍正九年（1731）臣遵旨成造文廟祭器一百六十一件，貯庫備用式樣六件」。¹³³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已東巡至曲阜，先詣先師廟。¹³⁴ 先導官孔繼汾目睹記錄此過程，於其《闕里文獻考》中，即記有闕里簠簋與乾隆十三年乾隆帝回鑾後命工繪圖的關係：¹³⁵

130《皇朝禮器圖式》序乾隆己卯（24 年，1759）夏六月既望御製並書。（清）允祿等奉敕撰，福隆安等校補，《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御製序，頁 5。

131（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 18，頁 6。

132「十二年奉上諭，朕幼誦簡編，心儀先聖一言一動，無不奉聖訓為法程。御極以來，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之切，如見羹牆。辟雍鐘鼓，躬親殷薦，而未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歉焉。仰惟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孔林，盛典傳于奕祀。皇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興廟貌，嘗遣朕弟和親王恭代展祀，未以命朕，意者其或有待歟？朕寅紹丕基，撫茲熙洽，思以來年春孟月東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壇，瞻仰宮牆，申景行之風，所有應行典禮至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詳悉具議以聞。其應預備之各衙門，宜先期請旨。尋大學士等奏闕里祀典，即係春秋丁祭之禮」。（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卷 48，頁 27。（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 75，頁 13；（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 16，頁 348。

133「為奏聞乾隆十二年（1747）十月十五日，經臣奏稱謹查得雍正九年（1731）臣遵旨成造文廟祭器一百六十一件，貯庫備用式樣六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內務府奏銷檔》，冊 36，頁 312-314。

134（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卷 48，頁 28。（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 137，頁 5。

135（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 19，頁 422。

伏睹我皇上（乾隆）十三年春時巡東土，駐駕廟庭，周覽古物，慨有更革禮器之意。遂於回鑾之日，命工繪式製造，而郊廟壇壝，簠豆尊罍簠簋之制，悉復古初。禮失而求諸野，則闕里亦後世徵文獻之所也。

孔繼汾的觀察與乾隆帝宣稱「悉用古制」與「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範銅為器，頒之闕里」的關係相互說明。而在雍正帝與乾隆帝在《皇朝禮器圖式》形成關係扮演要角的，正是承作二朝文廟銅祭器的允祿，也是《皇朝禮器圖式》「總理禮器圖館事務」的和碩莊親王。

雍正帝送給闕里的簠簋銅祭器，則扮演極重要的視覺圖像，成為乾隆帝與允祿攜手為《皇朝禮器圖式》確立禮器器制典範不容忽視的觸媒。¹³⁶ 通政使留保在雍正七年督工曲阜孔廟大成殿重建工程，即曾奏請皇上「聖廟所用祭器，係前明之物，請命內府另製大成殿祭器一分，鐫勒年號，頒賜廟中」，¹³⁷ 雍正帝於雍正十年水運送達的雍正年製款畫珪瑯五供及大清雍正庚戌年款的銅簠簋等，一為新研發的釉色與技法，一為復古器制與質材，皆前明所無，《皇朝禮器圖式》的復古形制，雍正朝已啟端倪。清王朝《皇朝禮器圖式》在乾隆帝「尊皇考範銅為器，頒之闕里」的悉用古名古制聲中，有別於明朝的盥盤充數，終於孕育形成了清帝國「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的國家祭器典範。

〔後記〕本論文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姚進莊（Josh Yiu）館長邀請，在 2019 年 1 月 26 日「皇朝禮器」清代祭器研討會宣讀。寫作期間，感謝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王健美女士（協助翻譯滿文資料）、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南孔廟、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孔廟國子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相關資料及陳思遠同學協助攝影。

136 乾隆帝在《皇朝禮器圖式》形成中所認知的雍正帝的闕里銅器等，諒非只有含混其詞。劉潞，〈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為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 4 期，頁 138。

137（清）杜詔、岳濬，《山東通志》，卷 11 之 4，頁 61。

表一 雍正帝贈曲阜孔廟五供琺瑯器尺寸重建（林家樂製作）

品名	潘相記載尺寸 ¹³⁷	公制度量衡 ¹³⁸	楊伯達測量尺寸 ¹³⁹	曲阜博物館 測量尺寸 ¹⁴⁰
琺瑯花瓶	高一尺八寸九分 口圓徑七寸五分 腹圓徑六寸六分 底圓徑八寸五分	高 60.48 公分 口圓徑 24 公分 腹圓徑 21.12 公分 底圓徑 28.48 公分	通高 70.5 公分 口徑 23.8 公分 腹徑 21.3 公分 底徑 27.5 公分	通高 70 公分 口徑 23 公分
琺瑯松竹梅	高二尺 圓徑一尺	高 64 公分 圓徑 32 公分		
琺瑯銅香鼎	高一尺五寸八分 口圓徑一尺一寸四分 腹圓徑一尺四寸六分 耳高八寸五分 耳廣三寸二分 耳厚一寸三分 足高六寸 足徑二寸	高 50.56 公分 口圓徑 36.48 公分 腹圓徑 46.72 公分 耳高 27.2 公分 耳廣 10.24 公分 耳厚 4.16 公分 足高 19.2 公分 足徑 6.4 公分	通高 71 公分 口徑 36.2 公分 腹徑 47 公分	通高 70 公分 口徑 36 公分
琺瑯燭臺	高二尺三分 上盤圓徑四寸 中盤圓徑一尺四分 座圓徑九寸	高 64.96 公分 上盤圓徑 12.8 公分 中盤圓徑 33.28 公分 底圓徑 28.8 公分	通高 72 公分 上盤圓徑 12.8 公分 中盤圓徑 33.4 公分 座圓徑 29 公分	通高 70 公分 上盤圓徑 13 公分 下盤圓徑 30 公分
金龍朱漆几 （香鼎几）	高二尺九寸八分 圓徑一尺五寸	高 95.36 公分 圓徑 48 公分		
金龍朱漆几 （燭台几）	高二尺九寸八分 圓徑一尺四寸	高 95.36 公分 圓徑 48 公分		
金龍朱漆几 （花瓶几）	高二尺九寸八分 圓徑一尺四寸	高 95.36 公分 圓徑 48 公分		

138（清）潘相等纂修，《乾隆曲阜縣志》。

139 換算根據：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

140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6·琺瑯器（二）》（石家莊：河北美術，2002）。

141 感謝孔子博物館提供。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明) 呂毖,《明宮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明) 林堯俞、俞汝楫,《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明) 陳鎬,《闕里志》(畫師安宗儉、刻手文景淳朝鮮刊本) 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明) 陳鎬撰,孔弘乾續修,《闕里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2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三十六年應明德刻本影印。
- (明) 陳鎬纂修、孔胤植重修,《闕里志》,明弘治十八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允祿等奉敕撰,福隆安等校補,《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允祿等奉敕編、弘晷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允祿等纂修,《大清會典·雍正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第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 (清) 允祿等奉敕撰,《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壬午年刊本。
- (清)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清) 王先謙,《東華續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 (清) 世宗,《大義覺迷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 世宗,《大義覺迷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3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據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
- (清) 世宗,《大義覺迷錄》,清雍正間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世宗,《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
- (清) 吳士玉、吳襄等奉敕撰,《御定子史精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吳士玉、吳襄等奉敕撰,《御定駢字類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李光地等奉敕撰,《御定音韻闡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杜詔、岳濬,《山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和坤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金之植等編輯,《文廟禮樂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清) 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庫勒納、李光地等奉敕撰,《日講春秋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乾隆九年敕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乾隆三年敕編,《御選唐宋文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乾隆五十一年敕撰,《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乾隆五年敕編,《世宗憲皇帝聖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康熙年間敕編;乾隆元年敕校,《日講禮記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 張安茂撰,《類宮禮樂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順治十三年刻本影印。
- (清) 張廷玉等,《明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梁國治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清)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 (清)鄂爾泰監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雍正九年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清)潘相等纂修,《乾隆曲阜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
- 《穆宗毅皇帝壽皇殿龕內供奉陳設檔》,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
- 山東大學歷史系、孔令仁等,《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3·清代檔案史料·3·公府組織與職掌(上)》,濟南:齊魯書社,198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北京:故宮博物院,201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近代論著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楊伯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0·金銀玻璃琺瑯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孔勇,〈乾隆朝《孔氏家儀》禁毀案新探——基於禮儀衝突與官紳矛盾雙重視角的研究〉,《文史》,2017年4期,頁253-279。
- 王光堯,〈明代祭祀用瓷研究〉,收入《中國古代的官窯與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2期,頁70-79。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 王柏中,〈清皇家內廟祭祖問題探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6期,頁60-63。

- 王朝霞，〈明清帝陵中石五供的禮儀制度初探〉，《碑林集刊》，2014年20輯，頁204-213。
- 丘光明編，《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 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 皮埃爾·綠蒂（Pierre Loti），馬利紅譯，《在北京最後的日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朱家溍，《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余佩瑾，〈內蒙古元代窖藏出土的鈞窯香爐〉，《故宮文物月刊》，212期，2000年11月，頁26-33。
- 余佩瑾，〈傳承突破與轉折——清雍正朝琺瑯彩瓷的發展〉，收入余佩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280-297。
- 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吳曉筠，〈《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脈絡〉，《故宮學術季刊》，36卷1期，2019年9月，頁115-149。
- 吳曉筠，〈孔廟與乾隆祭器的設置〉，《故宮學術季刊》，37卷2期，待刊稿。
- 李久芳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9·竹木骨牙角雕 琺瑯器》，合肥：黃山書社，2010。
- 李久芳主編，《金屬胎琺瑯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 李作智，〈呼和浩特市東郊出土的幾件元代瓷器〉，《文物》，1977年5期，頁75-77。
- 岡田衛、相賀徹夫、相賀昌宏等編，《世界陶磁全集·宋遼金》，東京：小 館，1977。
- 林海籌，《聖廟釋奠儀節》，臺南：臺南以成書院，1933。
- 侯怡利主編，《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琺瑯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 施靜菲，〈十八世紀東西交流的見證：清宮畫琺瑯製作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宮學術季刊》，24卷3期，2004年春季，頁45-95。
- 施靜菲，〈雍正朝琺瑯器中的仿古品味〉，《故宮文物月刊》，319期，2009年10月，頁76-83。
-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 施靜菲，〈文化競技：超越前代、媲美西洋的康熙朝清宮畫琺瑯〉，《民俗曲藝》，182期，2013年12月，頁149-219。
- 施靜菲、王崇齊，〈乾隆朝粵海關成坐之「廣琺瑯」〉，《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5期，2013年9月，頁87-184。
- 施靜菲、彭盈真，〈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29卷3期，2012年春季，頁1-74。

香港藝術館編，《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7。

胡櫨文，〈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36卷2期，2019年10月，頁115-185。

徐鑫，《大清皇陵私家相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

馬國賢（Matteo Ripa），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張婧文，〈元明清組合式陶瓷供佛器研究〉，《中原文物》，2017年5期，頁115-122。

張富強，《景山壽皇殿歷史文化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張榮，〈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1期，頁80。

張學諭，〈技藝與皇權：清宮造辦處的歷史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6。

張臨生，〈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故宮學術季刊》，17卷3期，1983年春季，頁25-38。

張臨生，〈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15卷，1987年2月，頁265-306。

張瀟予，〈清雍正朝銅胎畫琺瑯器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8。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協會科學史所合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郭家彥（Lain Clark），《皇朝禮器》（For Blessings and Guidance: the Qianlong Emperor's Design for State Sacrificial Vessel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9。

陳冬冬，〈乾隆年間《孔氏家儀》文字獄案〉，《歷史檔案》，2015年4期，頁128-131。

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進口的禮樂器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春季，頁123-184。

陳芳妹，《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陳建明主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

陳夏生，〈再談清代服飾中的朝珠與手串〉，《故宮文物月刊》，274期，2006年1月，頁88-96。

陳夏生，〈明清琺瑯工藝概論〉，收入陳夏生、蔡依倫，《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陳國棟，〈怡親王允祥與內務府造辦處〉，收入余珮瑾主編，《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264-279。

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

-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馮爾康，《雍正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 黃清華、黃薇，〈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瓶考〉，《文物》，2010年4期，頁64-76。
-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5・琺瑯器（一）》，石家莊：河北美術，2002。
-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6・琺瑯器（二）》，石家莊：河北美術，2005。
- 劉潞，〈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為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頁130-144。
- 謝璿，〈元代釋奠祭器研究——以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祭器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Brinker, Helmut and Lutz, Albert.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New York: Asia Society Galleries 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1989.
- Medley, Margaret.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31(1957-1959): 95-105.
- Melchers, Bernd. *China: der tempelbau die lochan von ling-yan-si ein hauptwerk buddhistischer plastic*. Hagen: Folkwang-verlag G. M. B. H., 1992.
- Musée Albert Kahn. *Chine, 1909-1934: catalogue des photographies et des séquences filmées du Musée Albert Kahn*. Musée départemental Albert-Kahn, 2002.
- Rawski, 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Publications, 2005.
- Stuart, Jan and Evelyn S. Rawski.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of Art: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ensheng, Lu and K. Murray, Julia. *Confucius His Life and Legacy in Art*.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2010.
- Wilson, Ming. "New research on the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album in the V&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8(2005) 51-59.
- Yiu, Josh. "The Display of Fragrant Offerings: Altar Sets in China." PhD diss, Oxford University, 2005.

圖版出處

- 圖 1 a. 香爐，燭台，乾隆四十一年蔣元樞監製銘，臺南孔廟藏，作者自攝；b.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五供。圖版取自中國金銀琺瑯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琺瑯器（二）》，河北：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冊 6，圖版 222-225，頁 74-75；c. 孔廟禮器圖。圖版取自《重修臺郡建築圖說》，〈孔廟禮器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a. 雍正帝送曲阜孔廟簋、銅、爵、豆、簠，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陳思遙攝；b. 簋、銅、爵、豆、簠。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1，頁 5-8、頁 12、頁 14；c. 孔廟禮器圖。圖版取自（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孔廟禮器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曲阜孔廟大成殿五供。圖版取自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Albert-Kahn：<http://collections.albert-kahn.hauts-de-seine.fr>，圖版 18，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 圖 4 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牡丹紋五供。圖版取自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琺瑯器（二）》，河北：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冊 6，圖版 222-225，頁 74-75。
- 圖 5 琺瑯松竹梅。圖版取自（清）潘相纂修，《乾隆曲阜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卷 9，頁 9。
- 圖 6 雍正帝畫琺瑯花瓶，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 圖 7 金龍朱漆几。圖版取自（清）潘相纂修，《乾隆曲阜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卷 9，頁 9。
- 圖 8 雍正帝送曲阜孔廟畫琺瑯五供禮物還原圖。謝璿製。
- 圖 9 a. 花瓶、燭台，局部；b. 香爐，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陳思遙攝。
- 圖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4，頁 580。
- 圖 11 雍正帝畫琺瑯香爐器底，「雍正年製」款，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 圖 12 雍正帝畫琺瑯燭臺底層，「雍正年製」款，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 圖 13 雍正帝畫琺瑯花瓶底層，「雍正年製」款，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 圖 14 琺瑯穿帶盒器底「雍正年製」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5 雍正帝畫琺瑯香爐三足足部樺卯，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
- 圖 16 康熙年製款冰梅紋五供。圖版取自侯怡利主編，《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33。

圖 17 康熙年製款冰梅紋五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花瓶、燭台，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陳思遙攝。

圖 19 纏枝蓮花（香爐口沿），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圖 20 a. 香爐腹部；b. 燭台座上；c. 花瓶腹部；d. 花瓶頸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1 a. 花瓶圈足；b. 香爐足部；c. 燭台下盤；d. 燭台上盤，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2 香爐，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圖 23 銅胎畫琺瑯黃地牡丹渣斗，康熙御製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銅胎畫琺瑯牡丹紋方壺，康熙御製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 a. 花瓶；b. 燭台；c. 燭台；d. 燭台；e. 燭台；f. 燭台；g. 燭台，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6 a. 花瓶；b. 燭台；c. 花瓶；d. 花瓶；e. 燭台；f. 燭台；g. 燭台；h. 燭台；i. 燭台；j. 香爐，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7 a. 燭台；b. 燭台；c. 花瓶；d. 花瓶；e. 燭台；f. 燭台，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8 a. 燭台；b. 花瓶；c. 燭台；d. 燭台；e. 燭台；f. 燭台；g. 燭台；h. 香爐；i. 花瓶，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29 a. 香爐；b. 花瓶；c. 燭台；d. 香爐；e. 燭台；f. 燭台；g. 燭台，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周盈禾製。

圖 30 香爐器腹之牡丹花纏枝葉，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圖 31 造辦處檔案：「文廟試供」。圖版取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4，頁 104。

圖 32 《闕里文獻考》。圖版取自（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卷 22，頁 507-508、510。

圖 33 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出土鈞窯己酉（1309）年款自名香爐。圖版取自岡田衛、相賀徹夫、相賀昌宏等編，《世界陶磁全集·宋遼金》，東京：小学館，1977，圖 103；李作智，〈呼和浩特市東郊出土的幾件元代瓷器〉，《文物》，1977 年 5 期，頁 75-77；余佩瑾，〈內蒙古元代窖藏出土的鈞窯香爐〉，《故宮文物月刊》，212 期，2000 年 11 月，頁 26-33。

圖 34 英國大維德至正十一年（1309）青花瓶。圖版取自岡田衛、相賀徹夫、相賀昌宏等編，《世界陶磁全集·宋遼金》，東京：小学館，1977，圖 49、50、51；黃清華、黃

薇，〈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瓶考〉，《文物》，2010年4期，頁64-76。

圖 35 元代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祭器。圖版取自陳建明主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80-181、184-185。

圖 36 禮器圖。（明）陳鎬，《闕里志》，明弘治十八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2，頁16-18。

圖 37 禮器圖說，鼎與燭台。圖版取自（明）孔弘乾續修，《闕里志》，明嘉靖三十六年應明德刻本，卷2，頁17、38。

圖 38 孔胤植重修《闕里志》（1609）。圖版取自（明）陳鎬纂修、孔胤植重修，《闕里志》，國立公文書館藏清刊本，卷2，頁3-6。

圖 39 壽皇殿內景，二十世紀初期舊影。圖版取自韓立恒，〈壽皇殿四百年〉，《北京日報》：http://bjrb.bjd.com.cn/html/2019-03/12/content_10215604.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11日。

圖 40 順治孝陵石五供《大清皇陵私家相冊》。圖版取自徐鑫，《大清皇陵私家相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57。

圖 41 養心殿佛堂的五供。圖版取自香港藝術館編，《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7，頁240，圖138。

圖 42 a. 花瓶腹部；b. 花瓶足部；c. 燭台頸部；d. 燭台座上，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陳思遙攝，林家樂製。

圖 43 五供中的寫實牡丹花。a. 牡丹，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b. 牡丹照片，圖版取自《中國花卉網》，<http://m.wndhw.com/huahui/daquan/dq021.htm>，檢索日期：2019年4月7日；c. 牡丹，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d. 牡丹照片，江南紫云攝影博客，嬌豔的牡丹花——白牡丹第7幅〉，《太平洋攝影博客》：http://img.pconline.com.cn/images/upload/upc/tx/photoblog/1104/21/c12/7397040_7397040_1303392495453.jpg，檢索日期：2019年4月7日；e. 牡丹，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f. 牡丹照片，《中國花卉網》，<http://m.wndhw.com/huahui/daquan/dq021.htm>，檢索日期：2019年4月7日；g. 牡丹，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h. 牡丹照片，局部，圖版取自 mei，〈牡丹花有多少品種，按照花瓣細分有6種分類〉，《發財樹之家》，<https://www.facaishur.com/mudanhua/3012.html>，檢索日期：2019年4月7日。

圖 44 a. 花瓶；b. 燭台；c. 香爐，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林家樂製。

圖 45 a. 花瓶；b. 香爐，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林家樂製。

圖 46 a. 燭台；b. 燭台；c. 燭台；d. 燭台，局部，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林家樂製。

圖 47 雍正七年（1729）《大義覺迷錄》。圖版取自（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清雍正間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3，頁34b、35a。

圖 48 文廟陳設圖。（清）允祿等奉敕撰，《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冊 39，卷 91，頁 32。

圖 49 文廟陳設圖。圖版取自（清）伊桑阿等奉敕纂，《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卷 64，頁 20。

圖 50 圓丘祭祀陳設圖。圖版取自（清）伊桑阿等奉敕纂，《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卷 55，頁 43。

圖 51 圓丘祭祀陳設圖。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撰，《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冊 35，卷 79，無頁碼。

圖 52 圓丘祭祀陳設圖。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冊 6，卷 44，頁 14。

圖 53 乾隆二十九年文廟陳設圖。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冊 8，卷 45，頁 30。

圖 54 a. 香爐、燭臺、花瓶。圖版取自（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9，頁 41-43；b. 北京國子監五供，北京國子監。中國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 55 曲阜孔廟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銅簠、銅爵、豆、簋，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圖 56 a. 曲阜孔廟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銅簋，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陳思遙攝；b. 北京故宮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簋，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57 文廟正位簋、文廟正位銅爵、文廟正位豆、文廟正位簠。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1，頁 28-32。

圖 58 簋、爵、豆、簠。圖版取自（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29，頁 20；卷 23，頁 9；卷 29，頁 40；卷 29，頁 20。

圖 59 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卷 2，頁 29-36。

圖 60 a. 簠、簋、銅爵、豆白瓷；b. 簠簋落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a. 銅爵、b. 白釉爵，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 62 「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3 「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簠蓋，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4 「大清乾隆年造」款，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5 「大清乾隆年造」款簠器身，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Ritual Vessels Presented to the Qufu Temple of Confucius by the Yongzheng Emperor: The Five Offering Enamelware Vessels and Bronze *Fu* and *Gui*

Chen, Fang-m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namelware offering vessels and bronze *fu* and *gui* ritual vessels presented by the Yongzheng emperor to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fu have perhaps received much less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than those of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empero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Qufu Temple of Confucius due to the fact that Yongzheng was on the throne for a much shorter tim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five painted enamelware offering vessels and their forms to demonstrate a complex context of a network involving the patron himself, the production of the objects, and the displacement involving different uses, offering a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ir vis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e study first attempts a discussion of this group of vessels from a point of view in which they were most directly used but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studied; i.e., the history of ritual vessels for ceremonial libation. From there, it is hoped that the confluence in studying painted enamelwa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offering vessels can highlight, via both “object” and “person,” the complex context of the patron’s status as emperor at the time of patronage, which is quit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is group of objects. The complex context of the patron in the confluence of the history of libational vessels, the history of painted enamelware, and the history of five offering vessels can help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copper-body painted enamelwa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ritual system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ve copper-body painted-enamel offering vessels presented by the Yongzheng emperor to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fu within the history of crafts and the history of rituals. The complex context of the patron can offer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ive copper-body painted-enamel offering vessels in the confluence of histories involving libational ritual vessels, painted enamelware, and five offering vessels.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the five copper-body

painted-enamel offering vessels, the bronze fu and gui vessels dated to the gengxu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30) are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relation to the ritual system later formed in the Qianlong emperor's *Illustrated Book of Ritual Vessels for the Imperial Court* as a way to restore the overlooked importance of the Yongzheng reign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ritual vessels in the Qing Empire.

Keywords: five painted-enamel offering vessels, Queli, Shouhuang Hall, ritual vessels for ceremonial liba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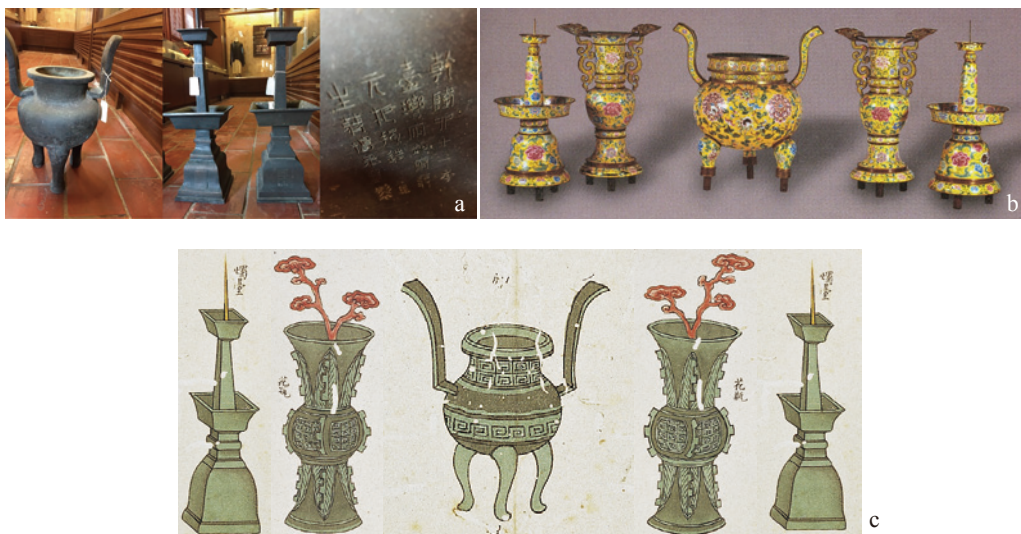


圖 1 a 香爐、燭台，乾隆四十一年蔣元樞監製銘（作者自攝）
b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五供（1732）
c 孔廟禮器圖 局部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a 雍正帝送曲阜孔廟簠、銅、爵、豆、簋（陳思遠攝）
b 《皇朝禮器圖式》簠、銅、爵、豆、簋
c 孔廟禮器圖 局部 《重修臺郡建築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Albert Kahn 拍攝曲阜孔廟大成殿五供



圖4 2002年《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所公布之彩版五供圖像



圖5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曲阜縣志》「琺瑯松竹梅」



圖6 雍正帝畫琺瑯花瓶中的銅內膽，用以插入琺瑯松竹梅（陳思遠攝）



圖7 乾隆三十九年（1774）
《乾隆曲阜縣志》「金
龍朱漆几」



圖8 雍正帝送曲阜孔廟畫琺瑯五供禮物還原圖（謝璿製）



圖9 燭臺、花瓶與鼎三銅足中之橫穿，疑皆為固定器與几（陳思遙攝）

孔廟香几石座路遠難去著本處做如本處不能再令石匠前往彼處辦做欽此

圖 10 「其孔廟香几石座，路遠難去，著本處做，如本處不能，再令石匠前往彼處辦做。欽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4冊，頁580）



圖 11 雍正帝畫琺瑯香爐器底「雍正年製」落款（陳思遠攝）



圖 12 雍正帝畫琺瑯燭臺底層「雍正年製」落款（陳思遠攝）



圖 13 雍正帝畫琺瑯花瓶底層「雍正年製」落款（陳思遠攝）



圖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琺瑯穿帶盒器底「雍正年製」落款



圖 15 雍正帝畫琺瑯香爐三足足部樺卯 中國曲阜孔子博物館藏



圖 16 康熙年製款冰梅紋五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上下承盤、燭臺與燭杆皆分開成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花瓶



b 燭台

圖 18 釉彩剝落露紅銅胎（陳思遙攝）



圖 19 纏枝蓮花（香爐口沿）（陳思遙攝）



圖 20 大型牡丹



圖 21 小型牡丹



圖 22 香爐腹部彩繪五朵盛開的紅色牡丹，間飾藍色小花、綠葉纏枝圍繞（陳思遙攝）



圖 23 康熙御製銘的「銅胎畫琺瑯黃地牡丹渣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康熙御製銘的「銅胎畫琺瑯牡丹紋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 粉紅色系牡丹花



圖 26 藍色系牡丹花



圖 27 綠色系牡丹花



圖 28 紫色系牡丹花



圖 29 藍色、綠粉色等相間牡丹花



圖 30 伴隨著的纏枝葉，強調翻轉的綠色或藍色的個別色階變化牡丹花（陳思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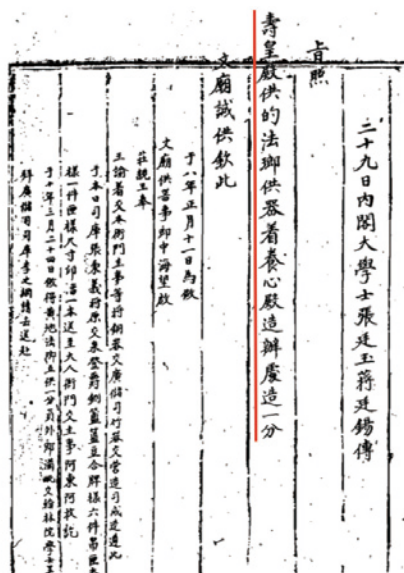


圖 31 造辦處檔案：「文廟試供」



圖 32 《閩里文獻考》



圖 33 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出土鈎窯己酉（1309）年款自名香爐



圖 34 英國大維德至正十一年（1309）青花瓶



圖 35 元代湖南瀏陽文靖書院在朱熹強調的簠簋之外加入瓶與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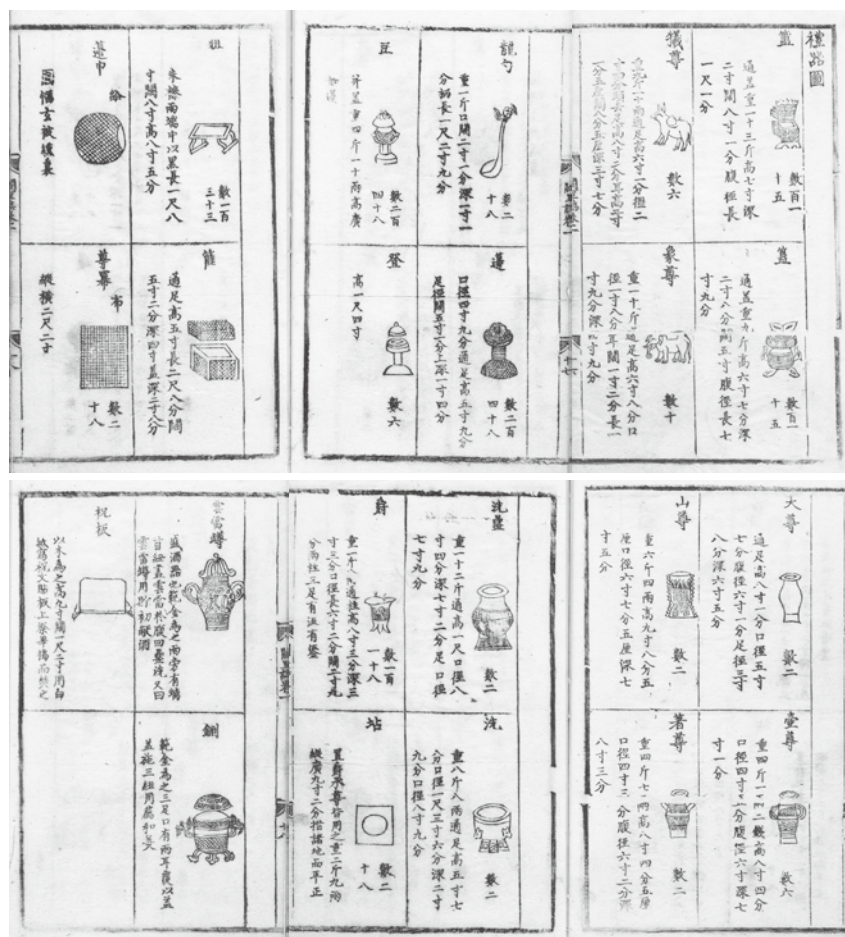


圖 36 明 陳鎬《閩里志》禮器圖 明弘治十八年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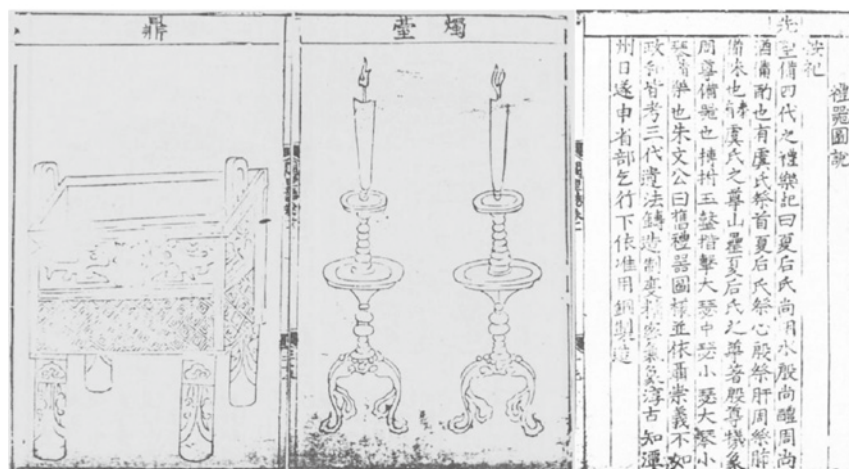


圖 37 明 弘治續修《閩里志》加入「鼎」與「燭臺」 明嘉靖三十六年應明德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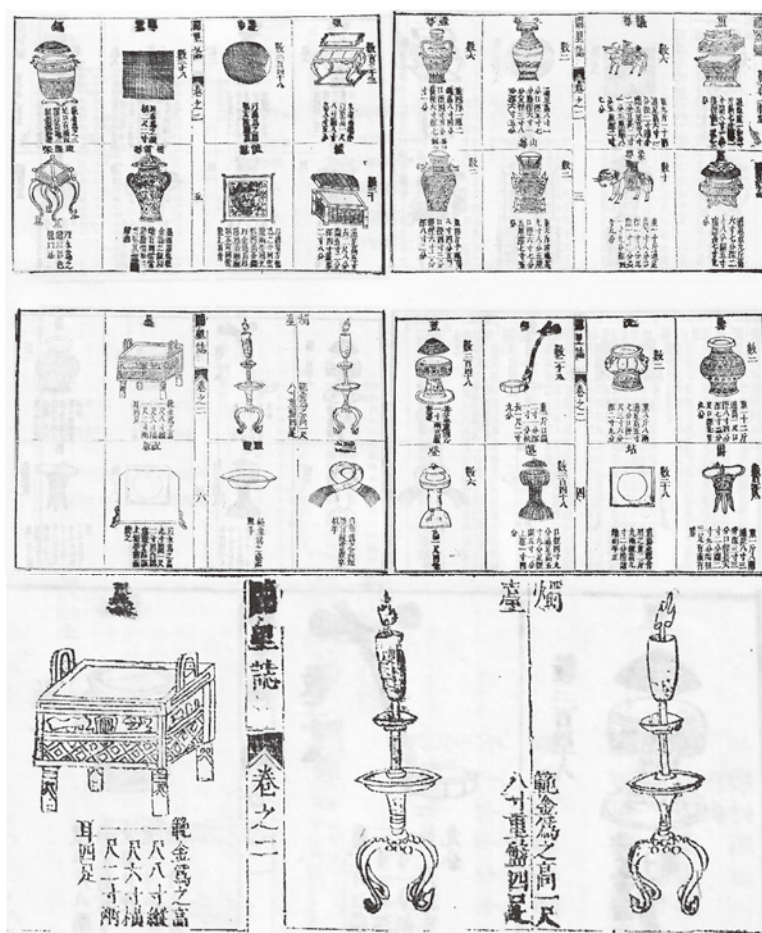


圖 38 孔胤植重修《閩里志》(1609)



圖 39 壽皇殿內景，二十世紀初期舊影



圖 40 順治孝陵石五供



圖 41 養心殿佛堂的五供



圖 42 五供中的綠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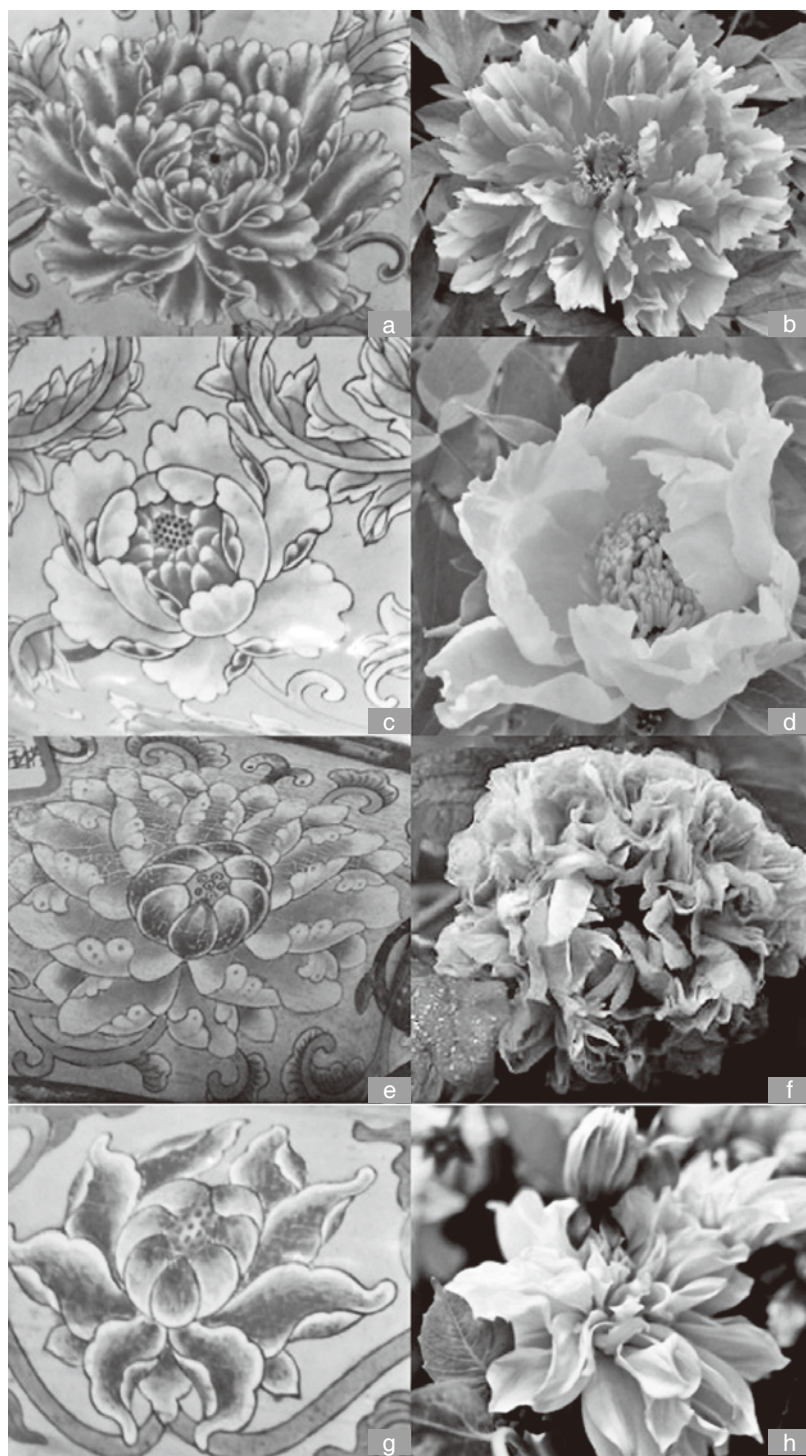


圖 43 五供中的寫實牡丹花



圖 44 五供中的稍圖案化牡丹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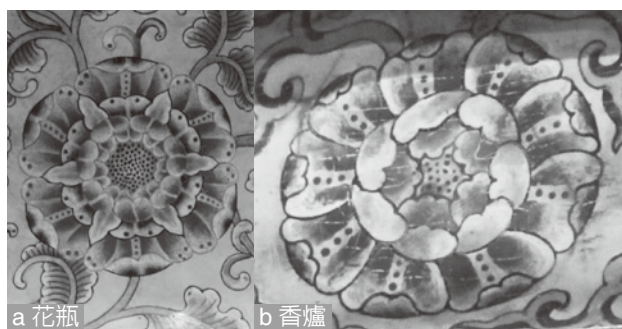


圖 45 五供中的圖案化牡丹花



圖 46 五供中的花蕊形狀誇飾化牡丹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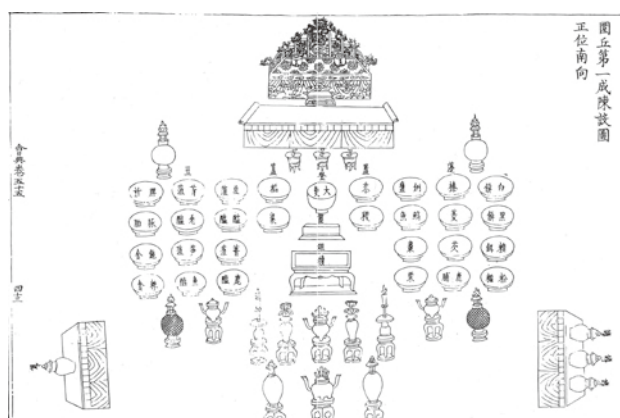


圖 50 《大清會典（康熙朝）》圜丘祭祀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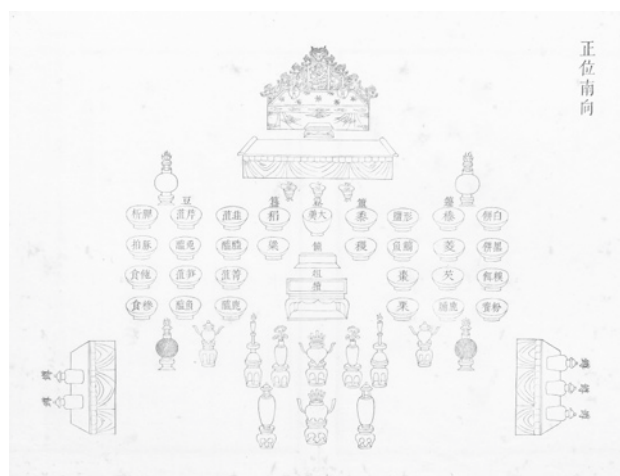


圖 51 《大清會典（雍正朝）》圜丘祭祀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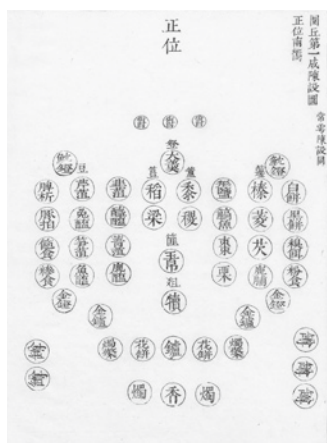


圖 52 《大清會典（乾隆朝）》
圜丘祭祀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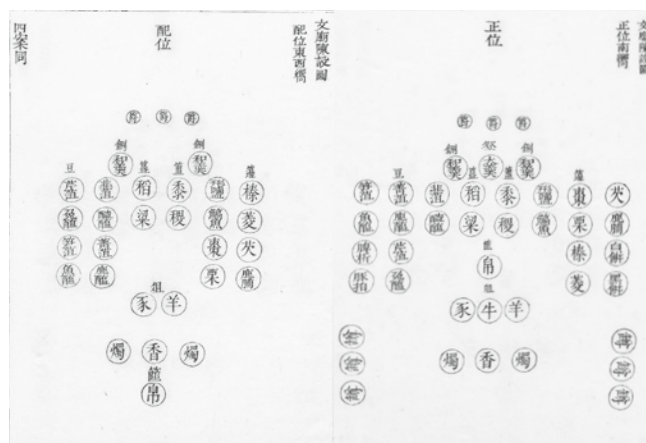


圖 53 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清會典》〈文廟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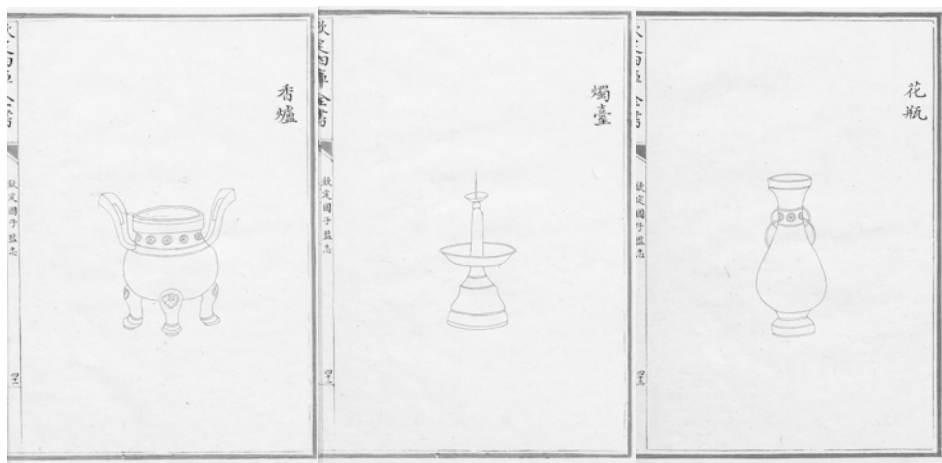


圖 54 a. 《欽定國子監志》香爐、燭臺與花瓶
b. 《欽定國子監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賜銅五供予國子監 北京國子監五供



圖 55 曲阜孔廟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銅簋、銅、爵、豆、簠（陳思遠攝）



圖 56 a 曲阜孔廟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銅簋與 b 北京故宮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簠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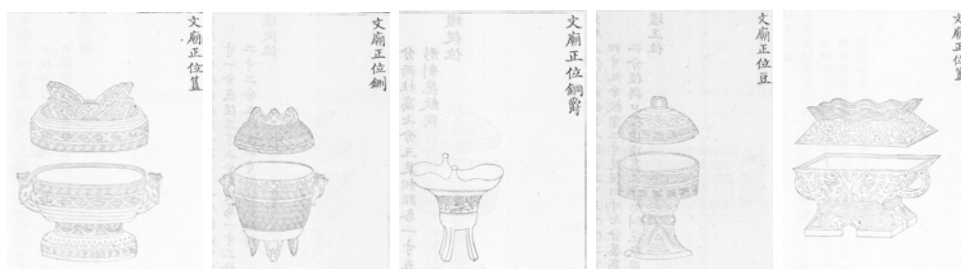


圖 57 《皇朝禮器圖式》簋、銅、銅爵、豆、簠



圖 58 《西清古鑑》簋、爵、豆、簠



圖 61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乾隆款 a 銅器 b 瓷器



圖 6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



圖 63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簠蓋



圖 64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清乾隆年造」款



圖 65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清乾隆年造」款簠器身